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 关于目前形势和行动的几点意见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周：

沪电转如下：

(一) 你们最近的电报，表示我们双方对于形势的了解，是没有分歧的。不过有几点必须提起你们注意，特别因为目前正在更顺利的条件，我们必须看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中的某些变迁，粉碎十九路军的左翼与停止广东军队右翼的进攻，给我们一种机会，能将我们的力量最大限度的转移到北方去。

(二) 北方敌人在赣江的右翼已有八师左右的力量，同时敌人大概还要从吉安方面集中抚河以西的敌人的中路，亦已有了新的集中。由此就可以得到结论：我们在敌人还没有开始进攻以前，必须扑灭目前较弱的敌人左翼，这一任务到九月半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我们那时才能居于有利地位，停止敌人中路与右翼逐步企图。

(三) 因此我们提议以下的初步步骤：

甲，在福建西南方，不要有较大的行动。在武平、上杭、龙岩的行动方针只发展游击的活动，正式的军队如三十四师，应集中在后方，准备即迅速的及时的回答敌人任何的行动。这

里主要的目的，并不是防卫已经得到区域，而是继续不断的扰乱敌人的实力。如若在这种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放弃连城时，也不要抽调任何新的军队来恢复它。

乙，对付广东敌人的策略，也是一样的，特别应在寻乌、安远一带发展游击使敌人疲于奔命。而使二十二师集中于右翼之后面，即□信丰之东北。

丙，驻于汀州、会昌的工人师，应暂时的作为三十四师与二十二师的后备军。

丁，其他一切的部队，特别是模范师，应该准备着加强我们在北方的力量。我们想在九月初能调动新的力量到清流区域，并要那里少共国际师会合起来，再向北移。那我们到九月半，即将有需两个新的强有力的师，作为东方军或中央军最亲近的后备队，至于归化清流的警卫任务。在九月初，我们即应委托某些独立团的队伍来担负。

戊，我们□□东方军，即三军团与十九师，业已首途北上，独立二十师、二十一师亦已在其右翼继续向沙县、延平掩护。我们任务就在八月以内，与兴国的力量合作，消灭将乐、顺昌警卫军队。引至郊外，那将更易于击败他们。独二十、二十一师应继续向延平，并其东方袭击，以掩护东方军的翼侧。如我们要得到充分的时间，在敌人大举进攻以前，扑灭他们的左翼。上述的一切行动，至迟在九月初必须完成。

（四）甲，九月初或者完结第二阶段的行动，应该是由东方军迅速消灭邵武的独立第四旅，并在九月半将一切增加的力量，集中在邵武、光泽、资溪区域。

乙，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在光泽、崇安、贵溪的三角区域以积极的游击战争，掩护东方军的右翼，完成了这种任务，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即告完结。

丙，同时当东方军取得邵武的时候，中央军应尽力使蒋^{〔1〕}敌的中右翼疲于奔命，扰乱他进攻的准备，最后在第二阶段的末尾应留下小的力量，如五军团钳制永丰、吉水区域的敌人，以便所有中央军的其他力量，都能移至宜黄区域附近。抚河准备第三阶段与东方军联合行动。

（五）由于敌人右翼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必须改变中央军原来的企图，我们在第三阶段中，应有以下的改变：

甲，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应继续向东北活动，直至信江。

乙，东方军打击与消灭了敌第五与第六师以后，即应不迟延的越过金溪向东乡进贤区域，先头部队所至应尽速的达到进贤。

丙，根据威胁金溪事实及敌人中路的行动，即可决定第一军迅速移至抚河的以东的地点与时间，以便尽速的完成消灭敌人的左翼。

（六）此后我们在第三阶段中的目标根据以上的改变，仍旧是抚河。不过进攻抚州的先决条件，是要完全毁灭敌人左翼的实力。现在仔细的计划进攻抚河的道路与第三阶段的行程未免过早。不过在九月间，敌人的左翼既经扑灭，即或他的中路和右翼能开始进攻，亦将失去效力，同时使敌不得不重新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十月间消灭敌人四五师的目的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我们即可在别的方面，开始我们的进攻，使我们大部分力量，尤其在北方在西南给敌人新的在冬季进行新的作战。我们想目前应该指出：冬季作战前以便你们在将来行动的区域中，开始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秘密的宣传队与游击队伍等等。各季的作战，将来开始向信丰、赣江方面的粤敌左翼进攻，以便取得赣江的左岸，援

助我第八军的扩充，并开辟到赣南与赣西的道路。这一作战将需要三万至四万人，其余的应扼守保持苏区的任务。根据上述的冬季的作战，我们目前就应即开辟在雩都区域，创造□至一万人的新的部队，这些部队的训练应在新年开始时完成。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

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和你们断绝了交通关系将近一年，仅从报纸上和个别的捷报中，一般的知道了你们的斗争情形，曾由中央苏区转给你们一个短短的指示，许多问题，自无从谈起。这次，四川省委已与你们打通了关系，并由省委转来了昌浩^[1]同志简要的给四川省委的信，仍旧无从了解你们的全盘工作。因此，我们只提出几个个别的问题，促起你们的注意，至于整个政治的和军事的指示，尚有待于你们迅速交来详细报告之后。

一、胜利的冲破四次“围剿”与第五次“围剿”中党的任务

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苏区及白区中广大劳苦群众对苏维埃与红军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的与完全粉碎了。我们巩固了原有的阵地，并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使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红军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增强了自己，覆没了敌人十几师，粉碎了敌人全部计划。这一伟大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在二三

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后结束了。东黄陂惨败后，蒋曾几次企图根据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这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防守政策，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的劳苦群众，苏维埃革命有强固与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惨败。同时在冲破四次“围剿”中，我们还有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主要的是未能将白区中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与红军胜利的配合起来，军事上未能建立全国集中的军事领导来配合各地进行战斗任务，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非常不够，战略与战术的活泼性很差，红军的组织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这许多工作中的弱点，妨害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在中国前面放着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或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或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完全瓜分中国以沦于完全殖民地化的计划。在这整个计划之中，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四次“围剿”粉碎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签订了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的“塘沽停战协定”，便抽调劲旅南下“剿共”；南京政府经过宋子文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大借款，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法西斯蒂的德国且专为国民党兴办了两个兵工厂，制造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武器；近且向日本直接乞援；大批法西斯蒂干部培养与调赣参加“围剿”；发行大批“航空公路”公债，剥削民众的血汗以充实“剿赤”的军费；拟定三年军事建设计划，开始召募与训练五十万完全法

西斯蒂化的军队，五千架战斗机与两千辆坦克车等，以大规模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召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和对苏区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帝国主义的作用更加强了，成立了共管中国的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步骤。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更进一步的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天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走近崩溃，更加使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

中央认为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战斗任务。

(一) 苏区的党的组织：

(1) 必须立即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领土及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号召与动员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2) 继续猛烈的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团，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以实际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制的步骤。

(3) 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4) 红军各部间须在整个的战争意志下进行战斗的任务。

(5) 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组织与援助白区

的群众斗争，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开展查田运动，巩固与中农联盟，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

（6）在胜利的冲破五次“围剿”的口号下，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7）为保障红军的给养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开展合作社运动、秋收与粮食收集储藏的运动。

（8）党必须加强附近苏区的白区中的工作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二）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反国民党的新的煽动，号召并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与群众会议，尤须加强在码头和运输工人中的工作。

（2）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信，注意争取我们对于满洲、河北及其他各地的游击运动的领导，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及在广大群众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之兄弟联盟的口号，加强拥护苏联的工作。

（3）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广大的群众工作，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攻。

（4）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的日常斗争，并引导到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

同志们！中国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火焰中。在完成这些任务中，你们光荣英勇的红四军实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二、目前四川的形势与红四军及四川党 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

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顺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这一顺利的形势决定于：

（一）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据《申报》所载，谓红四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广、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坚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区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红四军入川后，更加兴奋了四川劳苦群众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演成了武装战斗的形势，树立起声势壮大的抗捐军和川中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这是削弱敌人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三）四川各系军阀间的冲突，又一次酿成了全川的军阀战争。刘文辉固然败退岷江西岸，或更被迫退入康边，但刘湘所领导之下的联军亦已创伤不小。而四川的统一，除我们以革命战争来完成外，对任何一个军阀都将是梦想。联军内部的冲突依旧是存在，防区割据的制度并不会就能消灭，这将继续牵制各派军阀，彼此削弱自己的力量。

自然，对于这一个基本上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骄自满，过于看低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轻敌而使鄂豫

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中央同时要求你们严重的看到下面的几个事实：

（1）据天津日本军事情报处报告，英公使蓝博生到四川重庆去的主要目的，是同刘湘讨论划定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和这两处贸易的可能，并且谈判二千万的英国大借款用以购买飞机、军火和其他商品。同时法国总领事梅礼霭也曾到过重庆，进行怎样把法国势力更深入到四川而巩固起来。这些事实，使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都不得不认为：“……四川军阀……接受新的借款，英国人就不但得以统治西藏而且可以统治四川了。此外，联合进剿四川东北边境红军的事实，也很有可能性”。

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四川革命运动的壮大，使得四川的统治阶级更直接的乞援于帝国主义，而且使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感觉到他们在西北统治的致命威胁。英国之实际占有西藏与向东进展，实在积极准备着就近的军事根据地，以企图直接武装干涉四川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法帝国主义者虽与英有利害的冲突，但在压迫苏维埃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你们应当看到这种逼近的危险，来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2）最近四川军阀战争以刘文辉之惨败渐趋结束，而刘湘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积极督促与帮助之下，对你们大举进攻的危险更加紧张，并将首先驱使四川较小的军阀为“剿赤”的前锋，以消磨我们的力量，而造成他的“优势”。南京政府蒋介石将更多依重刘湘，资助他来与我们为敌，你们决不应该轻视这一个反动武装所给与我们的困难与威胁。

（3）四川党的薄弱，没有很好的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还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这些游击队伍中，有的还在反动豪绅操纵之下，没有完全夺取到我们领导之下，把他们的行动汇合起

来，统一起来，很有被军阀武装暂时击败的可能。

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锐敏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的形势是给你们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极大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变成实际。自满于胜利的可能性，而不以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斯达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的指示，是值得你们深刻去了解的。

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你们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是：

（一）巩固现有的苏区与将这些苏区联合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的支柱，没有红军则苏维埃政权无从树立得起；苏区是红军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

（二）为巩固苏区与向前扩大，必须加强和扩大红军。中央认为你们有一切可能和必要在今年内创造真正富于战斗力的主力军五万人。这样，才使你们能打碎任何敌人的优越部队和夺取中心的城市。

（三）必须动员你们一切力量和整个的四川党来争取十数县以上的抗捐军的领导，及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

战争。报载川滇边（古宋一带）的游击队拥有四千余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务必派人去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整个计划中行动，以配合红四军主力的作战。

（四）你们现拥有三千里以上的苏区，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使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非常必要。

（五）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六）加紧反帝的工作，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开幕，你们和四川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以加强反帝工作来拥护这个大会，应加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及到处建立反帝的群众组织，筹备召集救国御侮的代表大会等，以动员群众。

（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今年“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你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二苏大会。在川陕各苏区举行各级苏维埃代表会，并选举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务须于十月底即派来上海。

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加强全线上的工作，工会工作尤居首要。你们应巩固与省委的联系，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

三、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的每一成绩，都将增加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国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非此最后堡垒，而亦遭受‘赤祸’之蹂躏

盘踞，将来发展，宁不可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中央向你们和红军四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昌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一) 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破产了。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空前的浩劫(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陷于饥饿、失业、破产、贫困的深渊中)。帝国主义公开瓜分中国，造成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罢工运动空前的高涨，反帝斗争蓬勃的生长，农民运动普遍发展，特别是红军与苏维埃的伟大的胜利——这些都表示出中国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与剧烈化。中国革命剧烈的发展，形成了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殖民地化的国民党道路，一条是自由解放独立统一的苏维埃道路。

国民党的破产，使得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它曾经企图采用各种新的欺骗手段，以继续自己的血腥统治，如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以至于无所不有的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开放政权”等等。然而，这些企图都遭了可耻的破产。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之下，地主资产阶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三期。

级的反动统治，只有更加崩溃。为了更凶猛的摧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为了镇压反帝反国民党的一切革命运动，为了进攻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垂死的反动统治，于是法西斯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这不是表示反动统治力量之加强，而是表示它的力量之削弱。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与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虽有共同之点（疯狂的白色恐怖，摧残共产主义先锋队，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它有种种特点。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政党，那么封建残余占优势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不能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派别。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去实行“对外政策上极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国际纲领”），那么成了帝国主义工具的中国反动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却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之下实行出卖民族利益和替帝国主义侵略作清道夫。如果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是在统一的独立国内而能采取独立的政策，那么，殖民地化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只能采取以帝国主义意志为转移的政策，适应对中国瓜分共管的政策，绝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统一。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支柱，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最反动的一部分力量上，主要的是军队、警察、民团、侦探、官僚、政客、革命叛徒和上层知识分子等等。法西斯蒂抱定一个目的“不断的进行争取士兵、团丁、警士……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的独裁政治，并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义，乃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见《政治评

论》五十六期上《中国往何处去?》一文)。但是法西斯蒂无疑的企图去影响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如经过青红帮等的流氓组织去收买一些工头与落后的工人,并且“以富农为骨干”去压迫农民群众(见蒋介石编的《匪情之分析与对策》小册子)。

(三)中国目前的法西斯蒂运动,是以卖国罪魁蒋介石军阀为主动且为他所御用的工具。法西斯蒂的组织,称为“蓝衣社”,又名“中国青年同志会”,它的前身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主持的CC,奉蒋介石为领袖,后来吸引同情他们的分子,遂形成现在的法西斯蒂组织。这个组织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间在南京正式成立的。发起人是贺衷寒、康泽、酆悌、曾扩情等等黄埔学生,他们现在也成了该组织的主要角色。按其党员成分说:法西斯蒂组织实际上是黄埔同学会的扩大,其中占重要地位的也是黄埔系人物。

法西斯蒂的全部活动,完全决定于卖国贼和刽子手蒋介石的行动与意志。他们称蒋介石为“领袖”(行文中遇此术语时必须另起一行),为“本会会长”等等。他们介绍会员时,先要考核对象“对领袖的认识如何”,“对本会会长之态度,尤应特别注意分析”;在考察会员生活时,先“从其所发之言论,所读之书,考察对领袖的信仰”;在宣传时,先“使民众认识本会会长的救国苦心及勇健行动”;在决定“斗争方式”时,应“基于拥护并扩大本会会长的政治主张及威信”,“因为我们领袖是政治上实际的负责者,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不能采取破坏现有行政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方法,以增加领袖的责任和顾虑”。

法西斯蒂的纪律是“盲目的绝对的服从”,是“棍棒的、机关炮的、炸弹的”。对于会员的处分,用各种奴隶式的刑罚,如禁监、罚钱、苦工、通缉、私刑等等。法西斯蒂所用的指示,俨如官场的公文命令,如“切切此令”、“转饬所属一体遵

照等由……为要”。法西斯蒂对于群众采取侦探的手段，他们所规定的“工作路线和方式”之一，就是“随时侦察——督促小组或组员，对非同志或政敌之主要分子，随时设法侦得其一切秘密，报告上级”，以进行打击。

（四）法西斯蒂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不外是投降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准备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蒂专政，镇压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一切革命运动，首先是苏维埃与红军，以加深经济的浩劫、民族的危机，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法西斯蒂的对外政策是：

（1）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法西斯蒂的匪首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公开反革命以后，一贯的采取出卖投降政策。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把东三省、热河、华北一手奉送给日本强盗，同时用一切方法镇压反帝斗争，首先去反对彻底反日的红军与苏维埃，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作清道夫。蒋介石已经宣言“攘外必先安内”，谁敢说抗日就要杀头。法西斯蒂机关报公开拥护卖国政策，他们说：“事实上失去了东北四省不足怕，再失去滦东，甚至再加上察绥，河北亦不足怕”；“中日协定姑无论其只限于军事而不涉及政治，即使怎样的丧权辱国，只须中国能于此得有收拾残局的机会，我们可以签订和应该签订的”；“我们的努力……要阐明中央最近的主张，和解剖现在的国情。俾使民众能了然于中日停战协定在精神上是胜利，至少是有利的”。这就是法西斯蒂的卖国辱国的真面目。

（2）不但投在帝国主义怀抱中来反对民众，而且极端仇视与反对中国民众的同盟者——苏联。中国资产阶级自从大革命中背叛了反帝斗争以来，便一贯的反对苏联，在一九二九年

对苏联所作强盗战争失败后，无时不企图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作反苏联的挑衅。去年虽然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之反苏联的阴谋并没有停止。反之，尤其是在日本及其傀儡“满洲国”企图直接掠夺中东路的时候，便用一切最无耻的诬蔑去攻击苏联，企图挑起反苏联的战争。在法西斯蒂的一切机关报，如《晨报》、《社会新闻》，向苏联发出最凶猛的狂吠，什么“赤色帝国主义”，什么苏联“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什么苏联与“日本及伪国勾结共同蹂躏中国”——总而言之，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以攻击苏联的污蔑，法西斯蒂都应用了。他们所以这样疯狂的反对苏联，无非为着在帮助帝国主义干涉苏联中得到帝国主义帮助，以反对中国民众，转移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去反对苏联，以表示其对日本强盗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忠诚。

(3) 中国法西斯蒂，亦如其他各国的法西斯蒂，公开鼓吹与准备帝国主义世界大屠杀。蒋介石刽子手在江西军队中的训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战是要爆发的，到那时候就是抗日(?)的时候……现在我们在洛阳已设置六个存军械子弹的大仓库，以作抗日(?)之用。美棉借款交付以后，军械子弹还要天天增加，火药库亦要天天增多”。在《社会新闻》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很快的到来——在这四年之内”，同时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给中国的影响决不能说(?)是很坏的”，因此，他们断定“我们并不恐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他们的党报经常鼓吹：一切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清算！”这样一来，中国的法西斯蒂是强盗战争的辩护人与放火者。他们拥护这种强盗战争是为着帝国主义的重分世界与瓜分中国的利益，至于所谓“抗日”

只是一种骗局，因为上面已经证明法西斯蒂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

法西斯蒂的对内政策就是：

第一，采取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反对我们的党和一切革命群众以及反蒋分子。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载着中国法西斯蒂的恐怖情形：“法西斯蒂暴力团的横行——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暗杀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这一切等等事件，给了中外人士一个大刺激。这种暴力团的尖刀不仅向着共产党员，而且向着反蒋派的政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派往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沪杭甬沿线去的侦探队、铁血团、团警班（法西斯蒂的政治警察）总计十组，团员达二百余人，尤其是蒋介石势力所及的江浙皖赣豫鄂等地，省政府的法西斯蒂化非常显明。现在上海市政府的市长吴铁城以下，公安局长文鸿恩、教育局长潘公展、社会局长吴醒亚、保安处长杨虎等都是有力的党员。市党部方面，执行委员吴开先这般陈果夫系的委员，也是法西斯蒂的铮铮人物……法西斯蒂暴力团的凶焰日益上升，演出许多流血的惨案，使得中国人方面，抱着极度的恐怖情绪。现在上了暴力团黑色名单的人，已有十多名，左联的重镇鲁迅身边危险，茅盾也被法西斯蒂下了逮捕令，这是确实的消息”。

第二，用全副力量进行对苏区与红军的“围剿”。为了这个目的，动员一切的反动舆论、军事、财政、法西斯蒂组织等。他们在其党报上说：“中国民族主要的大患，不在封建残余与国民之贫乏，而在共产党的滋长”；又说：“我们同志在此大举围剿共匪（？）之际，应深切了解中国革命（？）之能复兴与否，决于是役，而时时准备总动员到匪（？）区作生死存亡的决斗和牺牲，这是我们最大的任务”。现在法西斯蒂匪首蒋

介石已经把自己的兵力都集中到江西，利用美棉麦及其他的借款作为“剿赤”军费，并买了大批的飞机炸弹去轰炸苏区，以法西斯主义去训练了五六千人的军事干部，并招募十五万新兵，以进行五次“围剿”。最近法西斯蒂决定派有军事学识的同志五百人赴江西担任“剿共”工作。

第三，拼命扩充军事力量以进攻红军和苏区，并企图实行更残酷的军事专政。自从法西斯蒂的宋子文在欧美得了大借款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以后，蒋介石便秘密制定了军事建设的“三年计划”，其内容就是：（1）在三年内成立六十师新军队，即为法西斯蒂党军，完全以黄埔学生为干部。在江浙皖豫湘鄂等省已开始招兵。蒋介石预定今年必须成立十五个师约十五万人。同时又在蒋介石所直辖的六七省内大大的扩充民团。（2）在三年内完成五千架飞机，这个工作完全由美国顾问主持。（3）在三年内完成坦克车二千辆，这个工作由德国顾问主持。现在蒋介石已于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一百五十团至二百团，闻九月底可以训练成功。现在洛阳已有德国顾问七十三人。

第四，教育文化事业的法西斯主义化，压迫学生的革命运动，造成奴隶式的法西斯蒂文化。上述的《每日新闻》同一期上登载了法西斯蒂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活动情形：“在这次暴力团事件发生的前后，最显著的是向来以秘密工作为主，努力于养成基本党员的蓝衣社运动，已经半公开的在学界中进行。这一倾向已经由长江一带波及于平津地方，而上海真茹的暨南大学，老早就因法西斯蒂的活动而极端右倾化。该校的校长郑洪年以下，教授刘秉黎、白瑜、孙白骞氏等已经入党。本月中旬以学生骚动为起点，驱逐左倾教授与共产主义学生，法西斯蒂化达于极点。大夏、光华、交通等

大学，也受这种运动的波及，中国公学的教务长樊仲云、傅东华等，也以担任文化运动有力的党员而活动，发行着机关报《前途》……蒋介石的蓝衣社……聘请二三十个德国人，做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或组织员。在南京用德国留学生大事翻译关系文献以分配各党员。”

最近蒋介石以每月数万元之巨款在上海组织法西斯蒂的文化运动，先从新闻、教育、艺术及出版事业方面着手。闻已吸收了文化界分子数十人，成立一组织，名为“干社”，即取蒋介石所谓“硬干、实干、快干”的意义。该社由潘公展、吴醒亚等为领导，该社的纲领是“以法西斯蒂的精神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该纲领认为法西斯蒂精神，第一是“服从”：“法西斯蒂的服从是盲目的绝对的，而且必须出以恭顺的精神”；第二是“硬干”：“暴力主义和强烈手段简直成为法西斯蒂的经典”；“对付反抗的棍徒，我们要随时准备五十万枝的棍棒；而且必要时还要准备十分充足的机关炮和炸弹。如果不倾耳而听我们宣传的，我们就要以棍棒对付！”；“私刑比什么刑罚都好！”法西斯蒂的恐怖主义的“文化”就是这样。

第五，法西斯蒂高唱“发展农业，改良田税”，“促进工业，养成劳资间互相谅解之精神”，甚至无耻的喊着“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剥削劳苦大众的资本家”（见《干社纲领》）。我们已经指出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经济只有走向破产、浩劫与殖民地的道路。法西斯蒂以其保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侵略、瓜分，维持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掠夺、苛捐杂税、军阀战争，加紧资本对劳动的进攻，特别是镇压与进攻已经得到解放的苏区工农群众等等的反动政策，只有使农业工业更加破产与崩溃。法西斯蒂宋子文已经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对他们的帝国

主义主人，宣布了法西斯蒂的殖民化的政策：把中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商场，而成为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的范围”，“吾人欢迎西方技术与资本，并愿维持不阻止外货入境之理财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只有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之加强，只有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促进中国经济的崩溃与殖民地化，使中国劳苦群众担负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和“繁荣新时代的极大要素”。这就是法西斯蒂所谓“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此外，由于实行加重剥削劳动的所谓“劳资间互相谅解”，使工人阶级更加痛苦。法西斯蒂在土地问题上，是保护地主私有制，保护地主、富农、高利贷的剥削，反对任何甚至改良的要求，使农民群众只有陷于破产、贫困、灾难、流离、死亡而已。

（五）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看出，法西斯蒂的政策，与现在国民党的政策，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法西斯蒂在自己的机关报上也宣称：“我们的行动不能采取破坏现有行政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方式……中国现有政治现状能够维持，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滋长繁荣”。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是相互联系着的。国民党统治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而且国民党统治的方法本身已经带有许多法西斯主义恐怖的因素；同时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为着挽救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崩溃。《社会新闻》上所发表的一篇《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的文章，其中说道：“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无论从国民党的立场上或它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出一点与法西斯蒂冲突的地方，恰恰相反，无论是三民主义或国民党的历史，到处充满了法西斯蒂的精神”。“国民党的发展，必然要走到法西斯蒂的道路，也只有混

和法西斯蒂精神，才能使三民主义更发扬光大起来！”不管法西斯蒂用怎样的形式去获得统治，是要国民党还是不要国民党，都没有关系，总之法西斯蒂如国民党一样，不但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任何一个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尖锐化。法西斯蒂不但不能“救中国”（如它所梦想的），反而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以至完全崩溃。因此，“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斯达林）。

（六）法西斯蒂运动的加强，法西斯蒂恐怖的加紧，把反对法西斯蒂的任务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目前在反对法西斯蒂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执行的任务就是：（1）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蒂的宣传鼓动工作，向广大的群众解释法西斯蒂整个政策的反动性，首先说明他们对于摧残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运动的恐怖政策，及其投降出卖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作用，使群众明白法西斯蒂是革命最凶恶的仇敌。（2）拿具体的事实给群众证明，中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而法西斯蒂是把中国引到瓜分共管的经济浩劫的道路，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是中国独立解放领土完整的道路，民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形式——法西斯主义也在内，拥护苏维埃，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3）在群众切身的要求基础上，在与这些要求的密切联系中发动各种反法西斯蒂的群众斗争，反对白色恐怖，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4）建立反法西斯蒂的群众组织，在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团结一切反法西斯蒂的分子，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5）利用法西斯蒂每个恐怖的事实去号召与动员群众组织革命的武装自卫，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的工农劳动者及其领袖。（6）在这次世界反帝大会中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揭破法西斯蒂对于这次大会的污蔑与破坏，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这次大会

成为反帝反法西斯蒂的大会。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今年的选举^{*}

(一九三三年九月)

毛泽东

同志们，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已开过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同志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 this 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同志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我的报告就在说明这个意义。我分做几段来说明它：

(一) 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 又在继续争取粉碎五次“围剿”胜利的年头

去年以来到东黄陂战争胜利，把敌人的四次“围剿”完全粉碎了。我们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区，发展了苏区，领导了帮助了全国反帝反国民党反地主资本家的伟大革命斗争。革命的胜利，比过去那一个年头的胜利更大。反革命那方面呢？他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上的报告。

们是更加衰弱了，但是反革命还在拼命的挣扎，特别是帝国主义因为全世界革命与战争逼在面前，他们拼命的向中国侵略。日本已在他们的炮火下建立了一个满洲国，还想要建立一个蒙古国；英国要在中国的西边建立西藏国；法国侵略云南、贵州；美国想瓜分长江各省。这些帝国主义都在指挥他们的走狗国民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进行对我们的大规模五次“围剿”。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百倍的努力去打破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更大规模的革命与战争是摆在我们面前。受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他是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今年的苏维埃的选举，正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关头，我们要选举出强有力的苏维埃来，组织战争领导战争，这是今年选举的十分重大意义。今年又是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年头，今年的全苏大会将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这是全国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要使二次全苏大会能够担负他的伟大历史责任，今年的选举就不能当平常一样看待。

（二）要明白选举的重要，我们还要来说明苏维埃的作用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有两方面的作用，这两方面都是与旧的统治阶级政府完全相反的。第一方面，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他用战争消灭外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反对敌人“围剿”，开展胜利进攻，向着全国反革命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任务。同时他又用法庭镇压内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对付 AB 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及一切存在苏区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一有反革命行为，我们就立即镇压他。革命的阶级——工

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同志们，大家看得到，我们现在是统治者，因为我们战胜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我们镇压了历来的反革命活动。再说到第二个作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我们工农群众的生活，过去完全是受地主资产阶级管理的，因为他们有政权，他们就有自由，而不给我们以自由，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劳动保护，现在呢？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有了劳动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政权给了我们以自由，我们在自己政权下进行各种必要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己管理着，我们内部是真正自由平等的，不受哪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干涉。而我们对于地主资本家，却是独裁，却是专政，不让他们有一个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设置各种法律管理他们，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这就是苏维埃第二方面的作用。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政权与选举的严重意义，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最积极的来参加选举。苏维埃人员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很好的去领导选举。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要把苏维埃与选举的作用即刻宣传到群众中去，首先所有苏维埃人员自己要完全认识清楚，才能使今年的选举成为最完满的选

举，才能一致动员起来为着建立强有力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

（三）今年选举中的顺利条件

目前既当着革命与战争的最紧急关头，苏维埃及其选举的作用又这样重大，那末今年的选举能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的，因为今年选举中我们有着许多顺利的条件。第一，敌人的五次“围剿”虽然规模很大，但我们已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我们在最近两个月内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第一仗占领连城打败十九路军，第二仗占领乌江打败第八十师，第三仗围困延平打败了敌人的增援队，共缴枪六千多支，我们是在红军大胜利中进行选举。第二，今年的选举我们是在更大版图上进行着的，因为我们在打破四次“围剿”中极大的扩大了苏维埃领土。我们今年是在十个苏维埃省内——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闽赣省、闽浙赣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鄂豫皖省、湘鄂西省、四川省进行选举。我们选举的规模是更大了。第三，在这许多苏维埃省中，农村里、城市里的阶级斗争今年比去年更深入了。查田运动的发展、劳动法的实行、文化教育的进步、经济建设的开始都得到了许多成绩。特别是查田运动把许多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坏分子也大批被洗刷出去了，使今年的选举得到更加顺利的基础。第四，我们还有着过去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的经验，使今年选举得到许多宝贵教训。过去选举中好的成绩我们今年一定要继续采取，并且要更加发挥。过去选举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就要完全避免他，丢掉他，不让今年的选举再犯一点错误。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已经正确的做了

总结，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成绩，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去仔细看清楚，并且要每个苏维埃工作同志都去看清楚，还要对一切选民群众解释清楚。只有正确的认识了过去的教训，才能使今年选举运动更顺利的开展起来。

（四）怎样指导今年的选举

同志们，我们明白了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积极瓜分中国进行五次“围剿”的时候，极大的增加了今年选举的政治任务。我们又明白了苏维埃的伟大革命作用，而今年的选举又是在许多顺利条件下进行着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很好的来指导这次选举，百倍努力争取这次选举的完全胜利。关于选举的原则与方法，中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及选举训令上已经说的很明白，我不须一一重述。今天我只把几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唤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关于选举的宣传鼓动、基本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报告、选举单位、候选名单、选民大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等这几个问题。让我把这些问题向同志们作一个简略的解释，因为这些都是选举中极重要的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注意的：

第一，关于选举的宣传。今年的选举必须在选举前三个星期内作最广泛的宣传。必须把粉碎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今年选举的关系说得最清楚；必须把苏维埃的革命作用讲得最明白；还要说明今年的选举是在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着的；使群众把选举看得极重要，同时又有着充分的自信心来参加选举，来推选许多先进分子进苏维埃，而一切当选人都有百倍的勇气来担当国家大事，这种宣传鼓动是选举胜利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的宣传鼓动，即是说群众还不了解目前的政治

形势，不了解苏维埃的作用，不了解选举胜利的基础，那么群众就不会很热心的参加选举，也不会使当选的分子百倍增加他们的勇气。去年的第一次选举宣传较好，成绩也就较好。第二次选举宣传差，成绩也就要差。今年则必须比去年第一次选举的宣传还要做得更好些，才能鼓动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

第二，城乡代表会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城乡选举是苏维埃的基本选举。城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扩大红军查田运动、实行劳动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工作，均须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执行，所以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并且，要全苏大会开得好，就必须由省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省苏大会开得好，必须要县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县苏大会开得好，就要区苏、市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要区苏大会开得好呢？就要乡苏代表会选举出很好的代表。这样看来，市苏乡苏的选举，岂不是关系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选举吗？所以说市苏、乡苏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同志们，我们会场的侧边正在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个塔是打下了一丈五尺深的石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脚，这就是城乡代表苏维埃了。

第三，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城乡苏维埃，不但要用最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而且要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他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去，这个工作叫做选民登记。这种有选举权人民与无选举权人民的严格划分，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出发点，是苏维埃宪法与选举法最重要的一条。你们看，那个

塔脚不都是石头筑的吗？所以这个塔是坚固的，如果掺杂一些污泥粪土进去，这个塔就不会有这样坚固了。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就要从不使一个地主、富农、资本家偷取选举权做起。

第四，去年的选举单位太大，今年把他改小了。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工人单独开会选举，农民以小村子为单位选举，城市中贫民群众则划分街道选举。这一个改变与争取选举完满胜利有很大关系，因为选举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好更多，日后的撤回权也更容易行使。因此同志们要注意今年的选举单位不可再弄大了。

第五，关于市苏、乡苏向选民做工作报告，中央内务部已拟了一个大纲，区苏要指导乡苏照着大纲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去年的选举，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种报告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向群众作报告，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的选举热忱到更高程度。区以上各级政府凡遇下级政府开代表大会的这一天，都应去做工作报告。

第六，关于候选名单。好好的准备候选名单，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关节。中央训令中说了：应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对候选名单的意见，并且公布出去，使选民对于各个被选举人能加以充分的考虑。候选名单中首先要注意成分，不但要照着选举法使适当数目的工人、农民当选，而且要依照选举训令至少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要使他当选，当选的应该全数是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分子。其次，工作能力方面也要相当注意，能力过于薄弱的亦

不宜引进到政府来。其次，现任苏维埃工作人员，如代表、委员、主席等，凡属犯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包庇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重大错误没有改变的，一概不能使他当选，但过去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同志，则毫无问题可以当选。有人以为选举就是一律推选新人，旧人一概不要，这完全错误的。

第七，关于选举大会。选举只须要一天工夫，却要把几个星期去筹备他。因为前面所述许多重要工作，必须有几个星期的筹备才能弄好。绝不可不早些筹备，一天捱一天，捱到选举逼近两三天，才手忙脚乱潦潦草草的搅一顿。现在北部十八县定期九月一号至十月五号为城乡选举期间。各区应该把选举的日子定在最后十天内，而把九月二十五号以前这几个星期极紧张的去做好选举宣传选民登记、工作报告、候选名单几项工作，才能在实行选举的那天得到完满的成功。南部十八县可以迟一个月选举，城乡选举日子可以定在十月底，而把九、十两月充分做准备工作。其次，选举的日子到了，必须尽量动员选民到会，今年必须办到最大多数选民都来参加选举会，并且须使选举在一次会上成功，不要弄到不足法定人数开会不成又要召集第二次会。其次，选举会上提出候选名单来讨论表决的时候，要发动群众发表意见，要与去年兴国一样选举会上有热烈的批评，群众不赞成的要另提候选人，绝对不能强迫群众去通过候选名单。如有坏分子捣乱，借着候选名单强迫群众通过，查出定要严办。其次，选举完后，还要讨论群众的提案，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到苏维埃来作为新政府的行政方针。

第八，一切以上的工作，须要组织一个专门机关来负责任，这就是市苏与区苏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政府及各个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而

成的，还要经过县苏的批准。选举委员会是负担着关于选举的全部工作。去年的选举委员会多半没有起作用，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因此许多地方没有很慎重的去领导选举，政府中坏分子操纵选举的毛病也是有的。为了要免掉这些毛病，今年一定要组织选举委员会，由政府与群众团体共同组织之。

同志们，我的话说得很多了，选举的意义和选举工作的要点，我也都说到了。没有说到的如县苏要有计划的去指导全县各个区苏代表大会，省苏要用有计划的去指导全省各个县苏代表大会，中央也是要有计划的去指导各个省苏代表大会，以及还有关于选举的别项事情，选举法与选举训令都有了详细的指明，这里我不多说。我说的那些要点，还望同志们回去告诉县苏、区苏的许多同志，要提到主席团会议上去作详细的讨论。同志们，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比平常的选举，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举，是一个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这次选举。除了前面所说选举本身许多工作以外，我们要抓紧这个选举时机，开展查田查阶级的斗争，开展苏维埃的检举运动。只有查阶级与检举运动，才能把偷取了选举权的分子查出来，把混进苏维埃中的坏分子清出去，使这一次选举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在南部十八县是更应该这样去做的，因为还有两个月时间给我们进行查田运动。还有，行政区域没有划好的，应该赶快划好起来。这样做去，我们坚决相信今年的选举是能够取得完满胜利的。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盼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睁起眼睛望着苏维埃的旗子，他们明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几天上海正在开全世界各国代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他们同样热烈盼望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应该回答这一切的

热望。我们拿什么去回答他们？拿我们全苏区的选举胜利去回答他们，拿我们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去回答他们。

我们的口号是：

争取选举的完全胜利！

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苏维埃中国万岁！

根据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红色中华》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

(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

六月二日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以后，三个月来，查田运动有了相当的开展，特别是瑞金、博生、胜利、兴国、永丰等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查田运动的全般的彻底的胜利，将使冲破五次“围剿”的决战有了更巩固的基础。

中央检查了各县查田运动中部分的材料，特别是瑞金比较充分的材料以后，认为胜利的开展着的查田运动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错误和缺点，应该迅速的纠正过来，以保障查田运动的彻底的完全的胜利。

(一) 在许多边区和中心县份的落后区，查田运动还没有迅速的开展，这因为有些地方党部的领导机关，没有认清查田运动的意义和重要，因而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个别的县份则因为不久以前还没有撤换机会主义的领导，如南丰、乐安、信丰等，有的因为地方党部和苏维埃机关中隐藏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者妥协分子，他们用种种方法阻碍查田运动。为着迅速的完成查田运动，各级党部必须把彻底开展查田运动当作推动一切工作的基本工作，动员全党去进行，同时要无情的打击一切对地主富农的妥协调摇，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对于不愿立即改正的动摇分子，应当撤换其领导工作。在审查阶级成分的时候不

要放过一个地主和富农，对于个别的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的错误应该纠正。

（二）另一方面，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着，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城市区北郊一个乡就有七家，踏径、下肖两区一部分材料中有十四家，北郊有一家还是红军家属，中市曾有中农要求改成分，瑞金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这种现象决不只瑞金才有，其他各县如果认真检查的时候，必会同样发现。中央坚决指出，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致破坏与中农的联盟，也即是破坏工农联合，必须刻不容缓的纠正过来，任何坚持自己错误的工作人员，必须受到党的严厉的制裁，必须公开的向群众纠正这种错误，使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是拥护中农利益的，侵犯中农利益只是个别党员的错误，并且受到党的批评和指责。凡属群众怀疑的表格应当在群众中重新讨论，最容易做错误的是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看待，所以在审查阶级的时候，应该特别仔细的去判别。

同时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个别的发现，对于反动富农的判断也有不估计到他在反革命组织中地位的重要与否，不估计他在革命以后是否遵守苏维埃法律，而只要凡是在革命前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如收三成租之内）都当反动富农没收。这种对于富农的过火政策，同样要危害与中农的联盟，都应该纠正过来。

在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富农过火政策的时候，决不是对地主富农让步，恰恰相反的是巩固我们消灭地主阶级和限制富农剥削的阵地。一切借口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富农过火政策，来实行对地主富农妥协的企图，都应严厉的打击。

(三) 在许多地方没收的土地、谷子、房屋、用物，没有迅速分给群众。有的地方不经过群众的愿意，把谷子保留起来，个别的地方还有没收的东西送给苏维埃政府，根本不分配给群众，有的地方分配东西的时候，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意见，而采用抽签的办法。为着使查田运动的果实落在群众的身上，责成各级党部把没收的土地、谷子、杂粮、房屋、一切用物等，迅速分给工人、贫农、中农，在分配的时候鼓动群众分一部分作红军公田，对于红军家属所需要的，要鼓动群众首先分给他们，对于以前逃出去现在回来的工人、贫农、中农，要一样的分给等等。立刻纠正在瑞金所发生的对他们收额外租税的错误办法。只有在群众自己愿意的时候，可以把谷子收藏起来，准备明年春荒之用或者用来买别的东西。

(四) 要反对在查田运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查田不经过宣传和讲阶级，不经过群众讨论阶级，不召集工会、贫农团会议，只由工作团或几个同志去秘密查田，甚至几个人黑夜去没收。如区苏批准阶级根本不审查表格，只照例盖章，甚至仅有姓名的表格，也被苏维埃盖章批准，认为地主富农把查阶级当儿戏。政府的工作团也常有不经过支部区委和苏维埃，而直接去进行查田的事实。所有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仅阻碍着广大群众参加查田运动的积极性，并且给地主富农以至反革命造谣捣乱的机会，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必须无情的打击这些各种各式的官僚主义。

(五) 责成中央政府党团和各省委县委对中央负责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为着百分之百正确的执行中央六月二日决议和这次决议而斗争。中央政府党团要经过土地部立即切实检查瑞金全部查田运动，纠正所有错误，并搜集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正确的分别阶级等以指导其他各县。

（六）在查田以前从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而在战斗及一般工作表示坚决与英勇的个别分子，对于他们的家属的田地，苏维埃政府应以特别的条例规定之。

中 央
一九三三、九、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 对游击队任务与对敌策略的指示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

周：

沪来电转如下：

(一) 我们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来结束福建与赣东北的作战。为着保持我们在福建已经夺得的区域，我们提议在福建、浙江的边界上以崇安、浦城、松溪为主要的根据地，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这一游击队的任务是：

甲、牵制福建军队向西北方的任何进展，从上述的根据地来威吓建瓯、屏南、古田，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好办法。

乙、阻扰敌人四师、五十五师、七十九师的行动来援助红十军，同时使这些敌人不能到西方去。我们必须很快的完成这一游击区域的创造，以便当我们的队伍在抚河作战的时候，而敌人的注意力仍集中于福建，甚至于浙江。我独立师在到达邵武之后，即应开到上述地点，开始执行这一任务。政和的土匪亦应补用来适合这一目的，适应创造地方武装等等。

丙、要保护连城、永安、延平以西的区域，仅派三十四师与地方武装恐怕是不够的。因此，应给工人师某些部队一种任务，要他们保卫大龙溪左岸的区域。

（二）直到现在敌人尚不知道我主力的真实目的，在此上述的步骤以后，我们应继续隐蔽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要向西北进攻，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的目的是在南昌。我们是用一切方法令我们前卫的部队能尽速的达到东乡、进贤区域，这一步骤的本身，也许就能够推迟敌人的进攻或者在敌人已经开始进攻的时候，使他停止一些时，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便获得了一切便利，使我主力在南城、宜黄周围的困难任务，更加容易。

（三）对于蒋介石的进攻，所应采取的步骤和策略，我们现在有以下几点建议：在过去几个电报中，我们已经向你们建议，我们如能在技术上抵抗敌人空中的袭击，现在来说这一任务的政治和组织方面：

（甲）应向所有城市中的居民充分的警惕这一危险，同时要防止夸大。在夜间空中的袭击大概是不会有，山坡中隐蔽起来是避开轰炸弹、燃烧弹与毒气弹的最好方法，各地应该作出警号、救火队，使人民不集中、分开居住和隐蔽等，粮应分散储藏，并应离开易燃的建筑物较远。

（乙）一切组织的领导机关应迁到城外附近的小村庄去，或者到郊外不明显的地方去。一切学校应该放假。

（丙）苏区内部的武装队伍，应驻扎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外面，特别着重于分散的野外的训练，这一点对于军事学校尤其重要。他们应在瑞金、会昌、雩都等地分成许多队伍，开始操演，同时即为南昌红军之总预备军。

（丁）地方的防空队，应经常在通达各城市的河流边岸、小山顶上，举旗为号，机关枪、步枪和旧式的土枪炮应在这些地方很好的利用。

（戊）对于作战的部队应广泛的向前线上每一个战斗员解

释：对周围举旗为号普通法则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等等；反对毒气轰炸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进攻敌军的后方，与敌人短兵相接，交换夜间的宿营等等；同时要有严格的纪律，以制止任何惊惶失措的发生。

（四）敌人正在广泛的利用蓝衣社的便衣队，企图向苏区内部进行特殊的任务。为打击这企图，城乡的劳苦群众与地方政权的合作是必须的。因此，必须：

甲、教育群众，使他们知道便衣队是什么东西，使每个人都知不报告村中生客或庇护这类生客是要负责的。

乙、组织少年先锋队的巡逻队，帮助地方政权，逮捕嫌疑犯等等。

（五）在每个区域的乡村中，应该加强地方武装，为着对付敌人的游击队许多邻近的乡村，应该有共同司令部指挥各村的武装队伍。

（六）根据报告，敌人在其进攻中将利用以下的策略：

甲、前进部队之第一线，将包括许多单位，每个单位均在一营以上，许多蓝衣社的便衣队都将分散在第一线的部队中，准备在这些部队前进以后，进行自己的任务。第一线队伍的任务就在吸引我们队伍与我们的队伍作战。同时，敌人后方较大的队伍则如钳子的形式前进，从第一线的两翼进发，企图达到我军的两侧及后方而消灭我军。注意到以上的策略，我们必须采取相当的行动方法。对待敌人队伍中的便衣队，应该是我们特务队的工作目的。

乙、我们只以让敌人的第一线部队前进几步，然后很大的用计转入翼侧，以便与敌人第二线突然的作战。在我们消灭了敌人第二线以后，我们才以小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第一线部队。而我们的其他各团或者从翼侧的外面追踵敌人取得再后方，或

者由于新来的敌人数量过大，则更将我军的翼侧隐藏，如是来破坏敌人的主要方向的进攻线。

丙、敌人认为他的第一线与第二线，在开始一天的作战不过只是初步的行动，而第三线的较大行动将在夜间行动，以后多半在次日清晨开始。由此可见，敌人已经正确的估计到他的第一线与第二线有被我们消灭的可能，但同时他们认为我军在开始的一天作战中已经消耗了力量，同时我们将敌方俘虏与战利品之获得，而因为胜利失掉了警惕心。这时敌人第三次的最强的进攻将在第二天的战争中使我军的胜利归于无效。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假若新编的一两师在第一天已与敌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战了一整天，那么夜里就应设法离开敌人转向新的方向，使敌人第一天的计划归于无效。敌人就不得不重新派遣侦察与吸引的队伍即第一与第二线。如敌人不照这样做，那他在第三线的行动将入于不可收拾的陷阱中。上述的几点策略意见，适用于我们所决定的主要防守的战线部分。在我们厚集大军，预备进行我们目前所决定的决定胜负的战争，此部署便不能完全适用，第二种情形应完全由前线的指挥者来领导。在福建的胜利以后，我们相信在第三阶段中发展，将是我们反对的打击了敌人的左翼及中路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如若这一任务要在让敌人右翼及中路的一部进入苏区的条件下始能完成，我们亦应准备这样做，以便打击敌人在赣江方面的进攻，我便能在抚河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将在下一时期引导到赣江方面的胜利。

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健全赤少队与今年举行 野营演习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 赤少队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特殊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它的伟大的作用与力量，同时又是红军有力的补充队。当目前粉碎敌人新的五次“围剿”中，对于巩固苏区，镇压内部反动之活动，防止敌人侦探与蒋介石蓝衣社、便衣队之骚扰，发展边区游击战争，钳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后方工作，更便利红军集中力量随时转移方向各个击破敌人，继续有组织的扩大与充实红军的力量。赤少队是担负这些任务的主要力量，成为争取五次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党必须以极大力量去加强对赤少队的领导，巩固和扩大赤少队的组织，加强政治军事训练，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同时以达到赤少队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队，实际的准备由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的军役制。

(二) 赤少队在过去工作中还残留着许多弱点和缺点。组织的涣散；动员的迟缓；没有将全部壮年青年吸收到赤少队中；许多县特别是边县的赤少队，大多数只是形式的没有实际

的担任卫戍和赤色戒严的责任；不能适时的充分的来担任后方勤务；异己分子仍有不少的混入在赤少队的组织中；政治委员与党代表制度没有实际建立，不断发现非党员充当政治委员和指导员的现象；军事和政治教育没有经常的进行；在配合红军作战中，时常发生违反苏维埃的政策和阶级路线的严重错误。因为有了这些弱点和缺点，使赤少队的全部，特别是边区赤少队，还不能成为巩固和发展苏区有力的地方部队，以配合红军和独立师团作战，不能普遍的继续的开展有组织的伟大作用。

（三）各级党部过去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和注意是非常微弱的，没有将这一工作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甚至将这一工作认为专属于军事机关而放弃了自己的领导责任，更少选派最好的党员去担任赤少队各级的政治委员和党代表。很多地方的党员和团员加入赤少队，还只是少数。这些绝不容许存在的现象要立即改正过来。

（四）为了扩大与健全赤少队，加强党对赤少队的领导，各级党部必须执行以下之决定。

1. 依据中革军委之新的改编计划来领导各级军事部和赤卫军迅速完成新的编制，首先恢复与扩大赤卫模范营的组织。动员党团员积极加入赤卫军特别是模范营，应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在“粉碎五次围剿”、“扩大并保卫苏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等口号下，并联系当地实际斗争和群众本身利益的具体口号（如查田查阶级斗争，冲破敌人封锁线购买贱价盐，保障土地革命利益等等），运用群众各种组织与会议，以宣传鼓动方式并从解释加入红军是工农阶级的权利，进行扩大赤卫军的运动，这样来动员凡是十八岁至四十岁的公民自愿的积极加入赤卫军，来扩大赤卫军

的组织，但必须严格防止不去艰苦的进行群众的政治动员，而用抄名字以及各种强迫的办法。

2. 赤卫军是带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它还有其他斗争的任务和作用（如参加苏维埃各种斗争，青年的、文化的、教育的等运动），因此，少先队的扩大应以青年群众为对象。在口号上除了政治以外，还要着重在青年本身利益与青年积极性上来发动青年群众加入少先队，应该运用少先队本身实际生活，以及文化体育娱乐各方面，更有力的来吸引青年群众热烈的自愿的加入少先队。凡是已经加入少先队的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劳动青年男女，可以不必加入赤卫军，而加入赤卫军之青年也不应强迫退出加入少先队，但少先队员有经常的输送最积极的分子到赤卫军的责任。必须纠正过去将赤少队的区别仅仅是在年龄上的规定（认为少先队是青年的武装组织，赤卫军是老年的组织），甚至仅在年龄上互相争夺队员的现象。党要打击将少先队变为赤卫军第二和附属组织的企图，同样的要反对将少先队与赤卫军对立起来的倾向，这都是没有认识赤少队的各个性质与作用。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与争取还未加入赤少队的壮年、青年全部自愿的来分别的加入赤卫军和少先队。

3. 为了严密和健全赤少队的组织，各级党部应领导各级军事部、少先队部进行队员和干部的检举，驱逐异己分子，改换赤卫军中不积极和开小差的领导干部，提拔新的积极分子来充任各级的干部，特别是提拔工人、雇农以加强无产阶级在赤少队中的领导作用。

4. 为了加强党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应由地方支部选派党员中最好的分子去担任赤卫军营连两级的政治委员、指导员和少先队的党代表，县区两级应有一个常委专任同级赤卫军的政

治委员并兼同级少先队部党代表，实际建立政治委员党代表的制度，以及赤少队中的经常政治工作。

5. 为了加强党员和支部在赤卫模范营的领导作用，党的支部可将参加模范营之党员依地区和连编在一个或几个小组内，能经常讨论赤卫模范营之工作，遇该连出发时，则将每连之各地方支部小组来成立单独支部。

6. 党对于赤少队的领导一方面经过政治委员与党代表直接去实现和执行党的决议，同时运用党的支部和党员在赤卫军中起核心作用，经过各级团的组织去领导少先队。各级党部应经常讨论和检查赤少队的工作。赤少队之政委、党代表要经常向党作工作报告。连指导员可兼负党支部的军事干事，县区政委兼县区委的军事部工作。

7. 少先队有它独立的组织与工作，只有属于军事范围（作战、卫戍和后方勤务、军事教育等）在前线则属于红军相关的军事首长之指挥，在后方则属于同级的军事机关（军区、县区军事部和赤卫军指挥部）之指挥。党责成各级军事机关立即派出军事代表为少队参谋长，以保持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实现军事教育，并以队长（团代表）、党代表、参谋长三人组织各级少先队部领导机关，但在工作中如队长参谋长有不同意的，则最后取决于党代表。

8. 中央局责成军委、军区协同边区党部，特别加强边区赤少队的领导，健全其组织，使它成为有力的卫戍部队和边区游击队，来担任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目前党应以最大力量来领导今年赤少队的野营演习。各地党部可依军委拟定计划来依照各当地情形，有一次专门的讨论，定出具体实施计划，以及在野营中党的工作。为了使这一野营演习顺利的进行，首先要在群众中进行最充分的宣传鼓动，来正确的解释野营演习的

意义和义务军役的宣传，纠正过去在动员赤少队加入红军中，曲解为就是实现义务军役的错误，以免妨碍野营演习。只有从阶级的觉悟与政治任务上以发动群众积极学习军事的热情踊跃参加野营演习，在赤少队队员大会上、干部会议上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会议上普遍的去进行这一宣传鼓动工作，使每个参加野营演习的赤少队热烈的自愿的来参加，而且均能按照规定，自己携米盐柴油，发动各团体拥护野营演习并捐助柴菜等物。只有在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与积极参加之下，才能更顺利的获得今年野营演习的圆满成功。

9. 加入赤卫军模范营的党员，须积极参加野营演习，并起积极的领导作用。进行演习之各地支部，立即召集赤少队模范营的党员开会讨论和计划野营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县区委依据各地野营演习地区与时间之规定，首先选派县区委中的常委任政委和党代表，去建立县区赤卫军的各级政治处，来负野营政治领导责任。并将每期参加野营的赤少队与模范营的党部，以连为单位，成立临时总支委，直属该县区委管理。这一临时支部，应成为野营演习中党的领导核心，积极为完成野营计划而斗争。

10. 各级党部应在今年野营演习中充分搜集对赤少队模范营的工作材料，以帮助今后党对地方部队的领导。同时每期野营完毕即须做出总结，如关于教育训练、党的工作、领导方式等，以作改正和补充下一期演习的计划和工作方式。中央局责成军委及各省委收集今年各地野营演习的材料和工作经验，以便明年更大规模在各地普遍实施野营训练。

11. 今年野营演习不是普遍实施，先从工作较好的县区开始，并分期分批进行。没有实施的县区同样的要利用这一农闲的时期，来进行经常的军事政治训练，并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

赤少队选举代表到实施野营的县区参观，以提高和传播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学习军事的广大运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 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四九、五〇及五一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的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等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的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

诚恳的揭露这一次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流露”与“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三）中央认为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居然能在《斗争》上好几篇文章中发现，这证明编者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与缺乏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因此中央认为《斗争》的编者必须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与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的检查《斗争》上的一切文章与其他刊物上的质量。同时为着保证《斗争》的政治领导，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以后一切比较重要的文章必须经过集体的审查，方可发表。

（四）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周恩来关于派人与十九路军代表 面谈给项英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项彭滕^{〔1〕}：

蒋、蔡^{〔2〕}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3〕}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二十二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4〕}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恩 来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滕代远。

〔2〕指蒋光鼐、蔡廷锴。

〔3〕指蒋介石。

〔4〕即袁国平。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关于近期作战方针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

沪电如下：

一、军委的布置对于目前的紧急事变是适宜的，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再不需要其他的建议或批评。因此，我们这一电中所提的意见的出发点，是根据十月二号左右的形势即当军委的命令业已实行，与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敌人的行动。

二、首先我们应清楚了解的就是为着打击蒋介石的第一步的迫切危险，使我们目前不得不放弃过去巨大计划，东方军主力自动的退出，就是放弃了我们在福建的主动作用，在这种突然的变化中就是包含着这种危险。我们在泰宁、建宁行动的根据地虽有他一切的优越战略的形势，但在翼侧和后方均有少许不便之点。在建瓯、顺昌、将乐有五十六师，而十九路军在其南、邵武亦将快要变为赣东北敌人增援的根据地。第二，在十月初我们就进入战略上防守的阶段，这一阶段到我们再起主动的作用，大概将要四五个月的时间。而进入这一新的延长的困守阶段之前，我们所有的一般责任，是没有能如我们按时的到达资溪、金溪区域时那一样的顺利。这里主观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在顺昌的区域延迟过久。

三、根据上述的情形，我们的任务如下：

(甲) 为军委命令新布置，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在黎川以北取得决定的胜利，否则敌从邵武、建瓯、顺昌区域来援的危险将要增加。因此，必须严格的经济我们的行动的时间，在行动以后就应该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与敌人作战，否则这种行动就是不经济的。顺昌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目前应避免围攻城市内的敌人，这同时就是说我部的行动应该采取在敌人没有达到城市以前，截击敌人的实力。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黎川周围的战争，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个步骤就要更小心了；那末，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以便在延平的防御中能取得时间。

(乙) 为着转移东方军的新根据地周围的不利条件，我六十一团与独立的队伍应用一切力量消灭仁寿的五十六师。如若顺昌将乐之围已解，我们必须切断这里面的城防军与邵武、延平的联络，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得不到军火和供给，给我们以后来消灭他们的机会。

(丙) 我们二十师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应企图达到适合的北方，在开始时应避免与敌人作战，以便与贵溪营及其他赣东北的队伍亲密的合作。

(丁) 我们愈扩大北方、东方的根据地，将愈容易防卫我们的主要根据地。因此，我们至少必须使游击队到崇安、松溪区域与红十军、十一军合作，牵制赣东北的两三师敌人不能在一两周内到达邵武，甚至我们冒险的提议派遣游击队绕过金溪到达东部去扰乱敌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袭击敌人，使之离开我们的主要根据地，以我们的主力在很小的根据地上袭击敌人，而没有这些游击的动作，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戊) 东方军在迅速的完成集中以后，应沿着福建的边界

向前推进，以便在黎川以北与敌人作战，如能按时达到资溪区域，并从那里迳向西方和西北方向，给我们的战争以更大的便利。如若敌人的空军积极行动，那末，在夜里行军和作战是绝对必要的。

（己）由于黎川的迫切的战争，重新布置中央军是正确的，不然在乐安、崇、黄的敌人开始前进的时候，他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在黎川的危险未去以前，中央军必须坚决的向南城以南与南丰以北的一段抚河。

（庚）在吉水、宁都间的山脉的北面，应该防卫起来，在其两翼应有较大坚强的防御点。在军事指挥部下面动员工人营在现在有极大的意义。那些还不能作战的后备军，应继续在上述山脉的后面地方受训练，不要抛弃他们的原始武装，而其余一切将要完成训练及形成的后备队应该集中在广昌区域。所有我们能够从南方和东南抽调来的力量，三十一号应开到这一区域，以为新军之骨干。

四、反对十九路军的策略应该是：

（甲）留游击队于他的后方。

（乙）由谈判者多方扰乱他的计划，同时尽力瓦解他的内部。假如能取得他们安静的代价，可表示愿意不打他们的队伍与宽大的划定目前占领区域的界线。在目前无论怎样应不睬他的进攻，因为需保持很大的力量将来对他，而目前没有停止他前进的必要，因为这只浪费我们的时间，宁愿让他前进到某些圈定的地点，我们暂时的失掉一点，但不要过用不适当的方法，在很坏的方向，企图停止他们，我们现在要推迟与十九路军的作战。

五、反对广东的策略是利用最经济的力量进行，继续不断的防御，并派游击队到他们的后方。

六、请再一般详告我们，关于东方军、中央军将来在广昌集中的队伍与南方队伍的战斗力，以及这些队伍平均的每一支枪的军火如何？

附一：军委关于消灭进逼黎川之敌的作战部署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朱周：

（甲）现赣敌似先以五个师的兵力进逼黎川，图解闽中之围，并正在继续抽调宜、乐、崇间军队，有转到抚河流域作大举进攻的部署。

（乙）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

（丙）各兵团行动纲领如次：

（1）第十五师留广昌之一团，应先速出黎川适当地点，构筑工事，掩护东方军集中。开宁化的第三师欠一团，取道建宁、康都兼程出黎川协助这一掩护任务。

（2）二十师继续活动于大小竹、杨坪地带，迟滞硝石和金溪方向敌人之前进，俟我东方军转到熊村、湖坊之线时，即北出钳制金溪方面之敌。

（3）三十四师应背靠归化方向，领导新独立部队，活动于将、沙中间地带。六十一团领导新的独立部队，活动于延平、建瓯间，掩护东方军撤退和集中，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4）东方军应即向泰宁适当地点集中（先撤收突入西芹部队，并特别注意掩护伪装）。

(5) 中央军方面如十四师现在宜南间时，则领导一、四两团出两南间，阻碍敌人进逼黎川和集中抚州，独二、三两团继续活动于永、乐、吉地带，吸引当前敌人。第一军团缺一师应速秘密转入宜南地带，参加会战。

(6) 各兵团行动的时间，由方面军自定，最好十月二日东方军能集中泰宁，一、二两师到河口、黄陂以东地带。

(丁) 建宁暂作东方军策源地，此电收时，望复。

军 委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附二：军委对作战部署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朱周同志：

我们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给你们的电令，现有以下的补充指示：

(甲) 东方军指挥抚河以东军队，以其有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敌人之目的，应该区分为两个纵队。其一：以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三、第十五欠一团第十九共五师两个团为右纵队，就近由万安寨经朱口、金坑、杉关、周湖源前，出相埠、寒丰桥地带，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原大小竹活动的二十师，须适时转出水口、珀玕地带，钳制金溪方面之敌，掩护该纵队的侧背，该纵队在运动中特别要秘密。其二：以第三师之两团、第十五师之一团以及三军团教导营为左纵队，各由现地出龙安镇、弋阳隘地带，钳制和截击钟贤、黎川附近之敌。

(乙) 中央军的一、二两师、十四师、独四团等，由宜南间向里塔圩前进，攻敌罗卓英纵队，但须以独一团迅速转到永乐地带，领导独二、三两团等，尽量吸引当前之敌。

(丙) 东方军右纵队的进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中央军的行动，应与东方军同时进行。

(丁) 你们特别注意派遣侦察部队，搜索敌情和领导地方部队游击掩护。

(戊) 你们根据此电令参酌实际情形的部署，望速电告。

项 英

九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亲爱的同志们：

因为交通上联系上的不敏捷和其他的原因，下面的信，我们仅仅是根据万永顺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一些五六月份材料来写的。关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全国政治环境及党的紧急的战斗任务，中央已经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上，给了全党一个明确的分析与提出了严重与负责的政治任务，我们不预备在这封信上再重复他，而想根据那个决议来给闽浙赣的工作一个检查。在这个检查之中，我们将只说到一些重要的中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还缺乏各方面的详细的报告与材料），希望你们能够根据这封信，更仔细检查你们最近一时期的全部的工作。

无疑的，由于闽浙赣的党的组织一般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依据于闽浙赣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之革命积极性的增涨，所以，虽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在与敌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及组织对苏区内部的反革命阴谋的坚强不挠的斗争中，胜利地保护了苏区的根据地，及时地破坏与扑灭了隐藏在苏区里面的反革命组织，开展苏区内的经济建设，相当地发展苏区与白区间商品流通与贸易，巩固与发展了党的组织及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三十一期。

周围苏区的白区工作之建立。这些当然是不可否认的重大的成绩，并且其中有许多许多的经验是可以供其他苏区的参考与学习的。但是当我们在检查整个闽浙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信不仅应该指出这些成绩，而且必须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的严重弱点，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自我批评是克服我们的弱点，巩固党的组织，开展我们工作的各方面的必要的前提。

（一）中央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在详细的分析了五次“围剿”中的各个问题之后，曾经锐利的在苏区党的前面提出：“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时期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同时，应该指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江西的党的组织已经在这个口号之下，真实地进行了布尔塞维克的动员，而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在这方面应该指出，闽浙赣的党的组织，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完全、差不多完全没有大量的扩大红十军，而且在六七两月的突击计划上写到了一切，甚至缴枪亦做出了预算表，可是没有一字、一句话说到扩大红军！！这几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然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不是偶然的遗忘（即是遗忘这样重要的头一等的任务亦是不能允许的），而是表示着闽浙赣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了解与忽视。根据永顺同志的报告说：闽浙赣党内有些同志认为在苏区扩大红军将要妨害苏区的生产，使劳动力感觉缺乏，因而这些同志认为目前扩大红军的中心，应该放到白区或灰区去。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与有害的。这是阶级敌人武断宣传的

影响在我们队伍中直接的表现。如果在闽浙赣几十万劳苦壮丁中扩大二三万红军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减低，那么如何解释中央苏区个别的先进县份（如兴国等），他的人口要比闽浙赣苏区少几倍，已经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壮丁要比闽浙赣多几倍，然而兴国的生产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在今年反而增加了两成收成。所以问题并不在以机会主义的借口来妨碍红军的扩大，问题是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劳动热忱。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最大限度的扩大红军的队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经过发动劳动妇女积极的参加生产工作之各方面，经过农村中劳动互助社的普遍的建立和党与苏维埃对于耕种运动各方面的经常的注意与努力，则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将农业生产提高到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所梦想不到的地步。为避免误解起见，我们应该指出：吸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革命的劳动分子，首先是产业工人加入红军是必要的。然而这不能够用以与在苏区内部扩大红军对立起来，成为放松后者的借口。另外一个同样是有害的见解，就是以为我们暂时还缺乏现代的武器（步枪、机关枪等等），所以红军扩大了亦没有用。因之，红五月中已自动报名几千人，我们并不把他们集中起来，同时雪片般的电报向中央请械。亲爱的同志们！这里你们忘了我们在今天环境下，当着我们暂时还没有大的中心城市与大的兵工厂制造厂的时候，我们的枪支子弹及一切武器是在残酷的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当着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新式武器时，那我们亦必须被迫的利用一切旧的武器，刀、梭标等等（在这方面闽浙赣的劳苦群众有着令人钦佩的伟大的创造力），把我们队伍——不但赤卫军与游击队，而且有时候正式红军部队亦是一样——武装起来，以便在战斗的胜利中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是国内

战争的规律。不说在鄂豫皖、湘鄂西、井冈山及赣东北苏区本身的发展的最初时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即使中央苏区在最近还是一样的。在五月中我们扩大了二万五千红军，创立了几个师。开始时，这些队伍差不多多数是没有良好的新式武器的。直到今年夏季及秋初东方军与中央军的胜利后，我们才能充实了他们的武装。这是在目前我们大量的扩大红军中所不可避免的阶段。革命的军队正是在这种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过程中，生长、强大与锻炼出来的。可以借口没有武装或者等待中央苏区的大批武器输送，而将那些已经表示热烈的愿以头颅热血来捍卫苏区，发展苏维埃运动的赤色战士闲散在乡村中，而不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不但是使红军不能实际的扩大，而且使我们保卫苏区的工作更加困难。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的存在，是妨碍我们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最大障碍。我们再一次警觉你们，就是红军是苏区的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坚强壮大的红军，是使我们难于胜利的保卫苏区，使他不受人蹂躏，与发展和扩大苏维埃区域。战斗的布尔塞维克的口号，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应该放到闽浙赣党的工作的首要的地位上去。应该在这个口号的周围，进行最广大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利用中央苏区的许多经验，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军为充足的新编制的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创立一个军团的目标前进。

其次，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包括着不仅红军之数量上尽可能的扩大，而且是应包括着红军部队之军事技术、政治工作及阶级自觉纪律之最大限度的提高，使红军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这里应该和部队中的各种游击主义之残余，轻视现代战略战术原则的应用之倾向作严格的斗争。在这方面红十军还是非常的落后，不论在军事技术与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

极大的落后于我们的主力红军。“提高与学习军事技术”，“以政治工作来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还没有能够普遍到各部队中去，战略战术的灵活的运用与深切的了解在干部中还极差，这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是军事指挥员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能够给与应有的注意。国内战争中的党，应该是军事化的组织。整个的党的组织应该最大限度的注意和学习军事问题，这里需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创立和锻炼壮大与强固的铁的红军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不是闭门造车的决定某个部队每月应行动几次，或会计式的制造缴枪预算表之类的荒唐事业，以及用一般的有时在原则上，甚至有错误的空洞话（如完成七八两月突击月计划的具体工作上说的：“在每一行动时，应很精细的估计敌人的行动、敌人的能力、敌人的接济、敌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选择最适宜的时候、最敏捷的路线、最优越的地形去进攻敌人，歼灭敌人。”之类），来代替有步骤的具体的对红军建设与战争的领导。

重复的说：要没有壮大的有战斗力的红军，要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任务，就是为着创立这样的队伍而用最大的努力——这是在今天环境中我们的第一等任务。

（二）国内战争的猛烈的环境中，而国内战争又是这样的坚苦的性质，使得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一切苏区内部的生活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不能不把“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当做我们一切工作的指标，尤其在今天的苏区的环境中，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上胜利的时候，这尤其是重要。一切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服从战争的利益，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在目前正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领土上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的任务就是巩

固苏区，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苏区，巩固苏区，而这里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决的发展与扩大苏区，苏区的扩大将使我们能够更好保卫他。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是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政治上消极的防御政策，不能使我们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更加不能完成我们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在闽浙赣的党的一部分同志中，浓厚地存在着保守主义的情绪。在军事上，我们始终不敢进行较大在白区中间的作战，战略战术上我们时常因为要防堵的原因将部队放在敌人分进合击点上，因此许多时候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胜利，游击战争之开展非常的不够等等。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在我们对于积极向外发展的极端的缺乏注意。我们依据着闽浙赣群众的积极性的发展上，在防卫苏区方面，我们尽了很大的力量，发扬了群众的创造性，发明与采用各种的防卫的武装方法，然而我们的弱点亦正就在这种单纯的防卫。所以，虽然我们所费的力量是不小，然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的苏区非但没有大大的发展，而且还遭受着敌人的几次的部分的蹂躏与烧杀，这就是因为单纯的防卫决不是真正的巩固苏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

其次，正因为这种浓厚的保守主义，“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并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自然，在经济建设或其他方面，闽浙赣的成绩不容忽视的。可是，有些时候，这种建设没有能够在上述的

列宁的口号之下进行。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工人的休养所的问题。据说这个休养所还办得不坏，工人群众很满意他，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多少是一种奢华的举动。当着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设备上能差强人意的红军伤病战士的医院或休养所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保证这个相当良好的休养所，给赤色战斗员与指挥员。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工人群众经济生活与文化水平之提高，相反的，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努力为着这个而斗争。但是我们应该告诉工人阶级，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增进基础，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统治，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彻底改善与解放的最重要的保障。

这些是说明着：在闽浙赣党的组织中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政治的倾向，这就是保守主义。我们的领导者并不了解目前全国情势之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以及积极的为着巩固发展联系苏区成为一片的任务，而以狭隘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区域，兢兢业业的保守他。正因为这样，我们忘却了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将我们全部工作服从于国内战争前线上胜利的口号。而实际上这种单纯的保守与防御的态度，都并不能真实地巩固我们的区域。

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来源，我们不能同意万永顺同志所解释的，似乎因为闽浙赣苏区是由农民暴动产生起来，所以保守主义是必然与不可避免的，这是无稽之谈，用以来减轻我们在领导中的错误的借口。这个倾向之政治上的来源，很明显的还是在我们，首先是领导的同志，对于日益尖锐化的全中国革命形势之估计不足，对于红军的军事力量之估计不足，对于苏区与环绕苏区周围之国民党区域中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之估计不足而来的。这个倾向是危险与有害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其

危险与有害的性质是更加增涨起来了。因为目前我们正处在全中国存在着而且日益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之中，我们正处在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剧烈斗争的关头。正如中央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所指出来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最具体与凶恶的步骤，他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与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为独立自主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目前的状况正是这样紧急的情况中间，要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只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克服这种倾向，使全党的同志了解这种倾向的错误及其害处，这是今后闽浙赣工作转变的必要的前提。反对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内广泛的开展，这便使得保守主义倾向有滋长的可能。我们认为必须在这封信的周围，开展最广泛的解释工作及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来保证我们工作上之必要的转变。

（三）最后，我们觉得必须说到的，是关于领导方式、思想斗争及自我批评的问题。

为着新的布尔塞维克的活动的具体领导而斗争，是改善我们工作的中心的主要一环。中央在一年来曾经用极大的力量，为着改变与消灭那种旧的、空洞的、一般的、恶劣的领导方式而斗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自然这些成绩，还是非常之不够的。说到闽浙赣这方面，那么应该说，必要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而且有些曲解与庸俗化了新的具体领导的问题。从六七两月的突击工作计划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把活的具体的领导一变而为呆滞机械的数目字的领导，整个的突击工作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会计式的表格，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计划。我们不去仔细的考查每一个工作的具体的情

况、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对于每个政治事变与问题之反映以及真实的群众工作，不去给每一个下层组织以必须的具体指示，而空洞的计划着一般的数目字，甚至制定缴枪预算表，决定每个部队必须行动几次等等。我们不是具体的去进行扩大与锻炼红军及游击队，教育与训练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而以决定必须要几次行动与缴几次枪为心满意足。而结果呢，自然可以预料到这个计划是不能完全的完成的，到那时候，我们再来检查指出一些成绩，指出一些缺点，从防卫保守一直到太平享乐等等，以后再来规定计划，制出会计式的数目字等等。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具体领导，而是具体领导的讽刺，布尔塞维克的具体领导需要的不是空洞的表格，而是经常的检查；真实的实际的领导，不以一种数目字而心满意足，而是要实际的工作计划与为完成计划而进行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说到自我批评，在闽浙赣的发展异常不充分的。有许多时候，甚至压制着自我批评的现象亦是有的（如对畴西^{〔1〕}同志），即在永顺同志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到，严格的对于我们工作之自我批评是缺乏的，似乎除了军事工作太差，军事领导者应负责外，其余一切都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同志们！这是有害的，自我批评之需要正像空气一样，我们要尽量地发展自我批评，这是克服我们工作中弱点与错误的唯一的方法。

思想斗争的开展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闽浙赣党内是若无其事的过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说明我们虽然喊着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怎样具体揭发在我们队伍中的不良倾向，还没有真实的注意。要使我们的工作能有全部的迅速的转变，重复说：开展反保守主义的斗

争是其先决条件。

这就是我们觉得必须指出的几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你们能够在中央各种文件上得到一般的指示，这里不再重复。

中央向着艰苦奋斗的闽浙赣的共产党员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刘畴西。

中革军委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 “围剿”的紧急命令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五次“围剿”，在我东方军与中央军清连、洋口与乌江等不断的胜利中，更加急迫的进行。最近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向黎川进攻，这是敌人正式的大举进攻的绪战。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就在眼前！

这一次决战，是关系中国两条出路——苏维埃新中国与殖民地化的决定胜负的重要关头，诸红军兵团、诸地方部队以及赤少队紧急动员起来，集中一切的力量，为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而斗争，这是每个红色军人当前的唯一的战斗任务。

诸红军兵团、各军区、各作战分区、各级军事部、赤少队部，应立即执行下列各项：

一、诸红军兵团、诸地方部队，可依照各作战的环境立即分别召集军人大会，赤少队以营或大队召集队员大会，根据总政治部第一号训令，特别着重目前争取决战的全部胜利的意义，进行紧急的政治动员，来提高和紧张全体红色战士的战斗情绪与斗争决心，以保证各个任务之遂行。

二、诸红军兵团立即并经常完成各种战备，依照上级指示的作战方略，坚决的迅速的实施之。

三、各军区、各作战分区，立即完成军委密令所指示各作

战区之布置，并责成军区对于所属之各作战分区的布置与实施情形，加以检查和指导。

四、各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连、游击队），依照各个任务立即出动，来打击、钳制、迷惑、疲劳各当前之敌，挺进游击敌之后方，以配合各战线基干兵团作战。

五、各地赤卫军及赤少队，在最短期内完成新的编制，并进行检阅一次，考察编制是否符合规定，武器是否齐备，加以改正和充实，并发动赤少队员准备充分火药，每人除备一支枪或梭镖外，应备扁担一根，五人共一担架，准备随时出动，以配合红军作战与担任一切后方勤务。

六、各作战地区及其附近各县之战地工作委员会立即组织和健全起来，随各战线之红军部队出发，指挥当地和邻近之赤少队，帮助收集给养、运送伤病兵、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等等，以便利红军部队随时转移方向和继续消灭敌人。

七、动员全部赤少模范营及赤少队，根据军委第七号训令严密赤色警戒，特别是建立盘查哨、游动哨、巡查队，来打击和消灭敌人之便衣队和侦探，以保卫边区，并帮助保卫局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之阴谋企图，巩固后方。

八、各作战分区，须依照军委密令，在战略与战术的必要上立即选择险要地，并完成必要的土围和工事，准备相当粮食与弹药，具体指定相当地方部队据守，并由各分区立即派专人去检查和指导，按级报告军委。

九、立即按照军委第五号训令，由军区、军分区、各级军事部指挥各城市、各乡村成立防空、防毒委员会，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和教育防空、防毒的简单办法。诸红军兵团、地方部队更加紧防空、防毒的教育，并完备防毒口罩。赤少队应在各居住地方领导居民挖备防空掩蔽部（俗叫飞机洞）、电光式的散

兵沟，并举行防空、防毒的演习一次。

十、责令各县、区军事部立即设立警号，每五里路设土炮一座，轮派赤卫军掌管，一遇有警，即鸣炮传报。至警炮识别的声响数，由县、区军事部规定，通报邻近县、区。

十一、兵站、卫生、供给等后方勤务机关，立即完成各种作战准备，以便依据战况开展迅速执行自己的任务，使前后方密切的联系起来。一切运输勤务和兵站、医院之警戒，均由赤少队担任。兵站与医院之首长对运输、警戒，有协同当地军事部指挥赤少队之权。

以上各项，须以最快的速度，限于十月二十日内全部完成，以利争取决战的全部胜利。责令各级政治机关根据这一命令，以充分的政治工作来保障以上任务百分之百的实施，对于执行命令不积极和怠工者，须给予军纪之制裁。

此令

代主席 项 英

副主席 王稼蔷^{〔1〕}

彭德怀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于本委员会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
工作·文献》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命令(第四十九号)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日本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特公布之。

(二) 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其因变更阶级成分而应变更土地财产之处置者：凡中农、贫农、贫民、工人等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等，过去已经分配者，均应设法照数归还其本人，但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以外之财产，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归还本人（如当地尚有地主财产可没收或有可能由分得者手中退回等）。凡富农应得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耕牛、农具等及资本家的财产，均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归还本人。

(三) 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司法机关判决之案件有不合本决定者：其已执行者，应维持原判不变更；其未执行或在执行中者，应即依据本决定变更其判决。

(四) 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及以后，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及因阶级成分而处置之土地财产适合本决定并无错误者，任何人不得要求变更其处置。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在分田与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的发展土地斗争，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决定：

(一) 劳动与附带劳动

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注) 这里应注意：(一) 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二) 规定全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全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有些人以为要有二人甚至全家参加劳动，才算这家有劳动，这是不对

的。（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与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蒔田、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五）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耘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六）劳动既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他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身从事主要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不得分配土地。（七）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暴动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

查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有劳动当作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判为地主，或以只有附带劳动当作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与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原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这种错误。

但上面的规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别情形下，须有不同的处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主而家中有人参加生产者。例如有人剥削地租债利的数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债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多，消费不大，则虽这家有人每年从事四个月以上的主要劳动，仍是地主，不是富农。但如人口甚多，消费甚大，则虽有百担租或千元债，只要有人从事主要劳

动，仍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第二方面，是拿剥削情形说是地主，但拿生活情形说则不能照地主待遇者。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暴动前数年，因死亡或疾病原因，突然丧失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地主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待遇是不妥当的，应照本人原来成分待遇。又如有人名义上还是地主，但土地权实际已属别人，剥削收入极少，甚至生活比农民不如，而本人已有附带劳动者，此种人应照富农分给坏田。其特甚者，在群众同意下，可照农民分田。再如有人过去是农民，暴动前二年遇特别机会突然致富，成了地主，土地固应没收，但因其二年前是农民，在群众同意下，亦可照富农分给坏田。

上述这些特别情形，查田运动中有些地方把他忽视了，这也是不对的。

(二) 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

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注) 这里应注意：(一)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其他中农则一般无剥削。(二) 富裕中农与富

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分时所需要的。（三）所谓富裕中农的轻微剥削，是指雇牧童，或请零工，或请月工，或有少数钱放债，或放少数典租，或收少数学租，或有少数土地出租等。但所有这些剥削，在其全家生活来源上不占着重要的成分，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四）在接近暴动的时期内，虽曾经有过与富农在同等时间内的剥削分量相同的剥削，但不超过二年者，仍以富裕中农论。（五）在某些情形下虽超过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为富裕中农。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些情形下，剥削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认为富农，而应认为中农。若没有这些情形，则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为富农，不应认为富裕中农。这些情形的正确判断，依靠于当地群众的公意。

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占着相当的数量，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他们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各地发生的侵犯中农事件，多半是侵犯了这种富裕中农，应该即刻改正。

举例：（一）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屋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

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一百元（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利息只三十一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二）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屋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的中农，还不是富裕的中农。

（三）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

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一）以暴动时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而不应把其他任何时间作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有些人算陈账，拿了中间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剥

削，作为决定阶级成分的根据，这是不对的。（二）以连续三年的剥削作为构成富农成分的标准时间。如果剥削时间不超过二年，或虽有三年而是中间间隔了的（不相连续的），虽其剥削分量与富农在同等时间的剥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农论。（三）剥削的分量必须是超过了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才能构成富农成分。如果剥削分量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虽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连续性，也不能构成富农成分，而仍是富裕中农成分。（四）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部分的合计，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产部分四百元，剥削他人部分一百元，合计五百元，即是总收入。因其剥削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农。（五）某些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因此生活并不丰富，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种情形下，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这里群众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形的考量，也是要十分仔细的，不应把富裕中农弄做富农，引起中农群众不满意。但同时也不应把富农弄做富裕中农，引起贫农群众不满意。所以应有仔细的考量，要取得群众的同意。

查田运动中对于这个时间与分量的问题，闹出许多纠纷，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或把富农当做富裕中农处置，中间的争论时常发生。现在规定的两者分界，可以免除这种弊病。

举例：（一）全家十一人吃饭，二人劳动。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实谷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

块，每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杂粮生产及养猪等，每年约值百五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个，雇了七年，到革命时止，每年剥削剩余劳动约值六十元。放债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时止。有一儿子是秀才，会做呈子打官司，借势欺人。判断：此家自己有劳动二人，但雇长工，又放债不少，剥削收入超过了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虽多，但开销后余钱不少，故是富农，应分坏田。他家有个劣绅，本人应不分田。（二）全家三人吃饭，一人能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税谷二担。放债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应分坏田。

（四）反动富农

在暴动前，尤其在暴动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叫做反动富农。反动富农应该没收他本人及其家属中参加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的人的土地财产。

对于反动资本家，适用上述的原则。

（注）这里应该注意：（一）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才叫做反动富农。如当暴动时领导民团屠杀工农，对革命政府顽强抵抗，特别是暴动后还在领导别人组织反革命团体机关，或个别进行重大反革命活动，如暗杀，当敌人侦探，自动替白军带路，逃往白区帮助国民

党，积极的坚决的破坏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等。这种富农出身而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经证明确实者，应没收其土地财产。其他富农中虽有反革命行为，但不是有领导的或重要的行为者，均不得没收其土地财产。（二）反动富农家属之中，只没收参加了这种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的土地财产，其他分子的土地财产，则不没收。（三）以找生活为目的而暂时跑去白区的，不是反动富农，不应没收家产。但不愿在苏区居住而跑去白区居住，满一年不回来者，虽不是反动富农，仍应没收家产。（四）对于反动资本家之定义与处置，完全适用以上之规定。

过去许多地方，把没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没收了，并且一家中把没有参加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来源，是在江西没收分配土地条例的第三条：“凡加入反革命组织（如 AB 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全家没收”，这里不分首领与附从，不分参加者与未参加者。关于家属问题，虽在这一条的后半指出了：“其家属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为，并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当地群众不反对者，得发还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没收，后才发还一部，仍非正当办法。因此这一条应照现在规定改正。又过去有些地方扩大反动资本家的范围，没收了一些不应没收的商店，这也是不对的。

举例：一家九人吃饭，一人劳动，又一人附带劳动。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实谷五十六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租三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块，每年出息大洋七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人。欠债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债大洋三百八十元，利

加三，放了五年。有一人当靖卫团连长，当了两年，与赤卫军作战五回。又有一人加入 AB 团一年，不是重要分子，无积极活动。家里其他各人无明显反动行为。判断：此家成分是富农。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动富农，应没收家产。其他各人不应没收。另一人虽加入 AB 团，不是重要分子，又无积极活动，也不应没收。

(五) 富农捐款

在削弱富农的政策下，在国内战争时期中，除了实行分给坏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这些基本办法外，再向富农要求临时捐款，是应该的。但必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捐款数目。并且要有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才能实行，一般的富农捐款数目的最高限度，应在命令上规定之。

(注) (一) 近来进行富农捐款，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庇富农不去捐款，一种是把富农现款捐尽与地主罚款无别，两者都是不对的，而后者则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并有影响到中农的危险。(二) 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农业税不同，故捐款数次应有限制，不能捐至多次无止境。(三) 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款。(四) 捐款的数目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以不妨碍富农生产为原则。国家财政机关应依当地情形规定一般的最高数目（例如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因战争需要曾临时规定富农捐款的最高限度为不超过富农现有活动款项全数百分之四十）。

（六）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

凡确定为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富农自己有处置之权，他人不得妨碍。仅在便利生产又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工农贫民才可与富农互相交换房屋。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发生工农贫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交换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甚至有交换衣服肥料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削弱富农”应有限制，分给较坏的劳动份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并要求捐出一部分现款，这样“削弱”的政策已经实现了。超过这种限制，就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在目前革命阶段上是不应该的。（二）所谓便利生产，是指有些地方富农住所附近无相当较坏的土地可分，因此富农分得的土地离开自己住所很远，而很远地点住居的工农贫民分得的土地又恰在富农住所附近，彼此耕种都不便利。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便利生产，可以互相交换房屋，但仍须得到富农同意，不得同意不能交换。（三）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以后，如富农分得之坏田已经改良变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交换。（四）暴动后富农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虽有多余，不得再行没收或交换。

（七）富农的义务劳动

富农应该比工农贫民担负国家及地方较多的义务劳动，但不妨碍富农的生产为限度。

(注) 责成富农担负义务劳动与责成地主担负义务劳动，应有分别。地主的壮丁，应该完全编入劳役队，加以训练，使之参加国家与当地的劳动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改造其阶级性，消灭地主阶级。富农应该比较工农贫民担负更多的义务劳动，但不应同地主一样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致妨碍生产。因此，把富农与地主编在一个劳役队，在农事紧张的时期内，在富农劳动力没有多余及没有补偿办法的情况下，使之担负长期脱离生产的义务劳动，是不应该的。但是不妨碍生产，或富农劳动力有多余，或有其他补偿办法，则不在此例。

(八) 破产地主

在暴动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但仍不从事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破产地主。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分配土地。

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有分配土地之权。

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来源之一部，其分量达到其一年生活用费三分之一者，得照富农成分待遇。

(注) (一) 有些人把部分破产的地主叫做破产地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地主还有一部分产业依以剥削，只不过剥削收入的分量有改变罢了。(二) 有些人把破产后已经从事主要劳动满一年的，叫做破产地主，这更是不对的。因为地主破产后从事主要劳动已满一年(指暴动前)，他已经由地主变为工人或贫民或农民了。(三) 有些人把

地主破产后已经从事一部分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若其劳动已达到维持全家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这种人已应该给予以富农待遇了。

（九）贫 民

工人农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依靠少数资本自己经营以取得生活者，均叫做贫民。乡村及小市镇贫民分子失业者，应分配土地。城市贫民分子无房屋者，应分配城市中地主的房屋。贫民均有选举权。

（注）（一）贫民在城市中占着相当的大数量，在乡村及小市镇上亦有一部分。贫民的职业是很复杂的，有些贫民的职业常依季候更换而不能固定。贫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其收入常不够支出。（二）工人农民外，如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小贩、不剥削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及其他一切劳动分子，均属于贫民范围之内。所谓独立生产者，是指各种自作自卖的小工业生产者，这种小工业生产者有时雇用辅助劳动力，但主要依靠于自己的劳动。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一切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业务，有时雇用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这种雇工行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

（十）知 识 分 子

一、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

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

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

三、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期间，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等等。把知识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分是不对的。把农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做一种坏的成分，更是不对的。（三）把当教员，当医生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

（十一）游民无产者

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

苏维埃对于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分子。关于争取一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土

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

（注）（一）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职业。有些人对于在业或半失业而兼从事一部分不正当职业（非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子，概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甚至把工农贫民中过去染有不良习惯（如嫖赌、吸鸦片）的人，都叫做流氓，这更是不对的。（二）有些地方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不加惩办，反而分田给他，这是不对的。有些地方对于一般游民无产者分子，又拒绝其分田的要求，这也是不对的。

（十二）宗教职业者

凡在紧靠暴动前，以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等宗教迷信的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无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注）（一）凡有这些宗教迷信职业而不是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及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满三年者，均不得称为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分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一律不分土地。即是说凡以这些宗教迷信为副业的，或依为主要职业不满三年的，如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在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如是富农，应照富农成分待遇。本人如此，家属更不待说。（二）真正宗教职业者的土地，一概没收，分给工农群众。其土地以外的财产，没收与否，依照当地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的意见决定。如果不得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同意即去

没收宗教职业者的财产，这是不对的。（三）菩萨神主等迷信偶像，也须得多数群众同意才能毁坏，仅依少数人的意见去打毁菩萨神主的办法，这是不对的。（四）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看地、算命等人不叫做宗教职业者而叫做流氓，这也是不对的。

（十三）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

（注）（一）优待红军条例：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这里本已包括一切红军战士在内。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二）所谓“红军战士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权利。（三）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如被开除军籍，得收回其土地。

（十四）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本身及其妻子，依工人成分不变更。其应分配土地与否，依其在乡村或在城市，分别处理。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或富农成分处理。

（注）（一）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暴动前，有人出

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分。本人及妻子照工人成分待遇，其应有的一部分财产不没收。工人本身及妻子如在乡村，应分配土地。本人及妻子如在城市，不分配土地。本人在城市，妻子在乡村，本人不分配土地，妻子分配土地。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分，依其成分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店依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分，又各依其成分而决定其在苏维埃法律下的待遇）。（二）农村工人、独立生产者、小学教员、医生等人中，有兼有小块土地，因乡村不够维持生活，出外谋生，而将其小块土地出租，并非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应照一般农民分配土地，不能当地主看待。

（十五）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 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

一、结婚的行为，不应改变阶级成分。

二、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依照结婚在暴动前后的分别，依照原来阶级成分的分别，并依照结婚后生活情形的分别，而决定其成分。

三、凡在暴动前结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

民或贫民成分。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一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则须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才能承认其为地主或富农或资本家成分。如生活不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同等而与工农贫民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四、凡在暴动后结婚的：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须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五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分，如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五、不论何时与何种成分结婚，所生子女的成分与父同。

六、土地与公民权的应否享有，依其成分。

七、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者，不得编入劳役队。随嫁的现款在五十元以下者，不得向他罚款或捐款。

八、暴动前，工农贫民以子女卖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及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卖子女及招来郎婿的成分与待遇，适用上述一至七条之规定。

九、暴动前，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子过继者，不问过继时之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分不变更。从满十岁起，工农贫民之子过继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过继于工农贫民，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三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注）这里所谓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

（十六）地主富农兼商人

一、地主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二、富农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照富农成分处理。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

三、对于地主富农兼商人的罚款或捐款，应限制在地主富农部分，不得侵及商业部分。

四、商人不编入劳役队。

（十七）管公堂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应分别地主富农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

（注）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但有些小的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作为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有些人以为只要管过公堂的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这是不对的。

（十八）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

在苏维埃机关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人员，未分配土地而

生活特别困难者，本人及家属可分给相当土地，或以其他方法解决其困难。

（注）已分配土地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决（即发动群众耕种其土地），这里只说未分土地的人员。所谓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十九）公共事业田

新区分配土地及老区检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时，应酌量留出为了桥梁、渡船、茶亭及农事试验场等公共事业而使用的土地。

（注）桥梁的修理，渡船的修理与船工的工资，茶亭的修理与茶水的设置，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均须按照需要程度，由当地区乡政府决定，酌量留出一部分土地，发动群众耕种。此外，县苏、区苏、乡苏还须在政府机关附近适当地方，留出一部分土地（县苏可留一百担至二百五十担，区苏可留十五担至二十五担，乡苏可留五担至十担），以为开办农事试验场之用。在农事试验场未开办前，可租给农民耕种，只收最低的地租。

（二十）债务问题

一、在暴动前，凡地主富农资本家以金钱或物品贷付于工农贫民者，除店铺贷帐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农贫民以金钱或物品存放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本利应照数归还。

二、依靠高利贷剥削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高利贷

者。高利贷者照地主成分处理。

三、在暴动后的债务，凡不违背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借贷条例者，均应归还。

（注）（一）有高利贷剥削（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论城市乡村，债务中最大多数，都是高利贷剥削），但不是依靠高利贷为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贷者而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应各依其成分处理。以为凡有高利贷剥削的都是“高利贷者”，这是不对的。（二）一面放债一面欠债的，应将其“欠人”“人欠”互相抵销，看其剩余部分的性质与程度，再与本人其他剥削关系总合起来，决定其成分。（三）店铺货账必须归还的理由，是为了不使商业受到损害，并且货账一般不能算入高利债务范围之内。（四）工农贫民相互间的债务应如何处理，由借贷双方自行决定。双方不能决定者，由当地苏维埃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 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全体选民同志们!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到今天，已经两周年了。去年的今天，我们曾向同志们做过简单的工作报告，现值两周年纪念的时候，应该把最近一年来的工作进程向同志们作个扼要的报告，并愿接受全体选民同志对于过去工作的意见和以后行政方针的建议。

同志们，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依靠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无论哪方面都是胜利的向前开展着，比一年前的形势大不相同。现在分开来说吧：

第一是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红军的扩大与加强。

一年来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这一战争是在全国各苏区都完全胜利了。依据不完备的统计，一年来消灭白军缴获枪支在十万以上。单只今年一月到六月的统计，消灭白军共四十一团六营十连，击溃白军八师三十三团十九营九连，缴获步枪三万一千七百多支，机关枪自动步枪一千多支，活捉师旅团长二十多人，打死师长二人，旅长以下死

伤不计其数。正因为我们这种光荣伟大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大大动摇起来，他们不得不组织五次“围剿”来向我们作死命的进攻。但是我们依靠着党的进攻路线，依靠着红军英勇与苏区白区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一开始就给敌人的五次“围剿”一个迎头痛击。连城、洋口、乌江及最近的黎川战役，我们都得了胜利，缴枪八千支以上。一年来由于工农群众勇敢向前加入红军，使红军比较去年扩大了一倍，并且在英勇的血战中锻炼成为强大无敌的革命铁军，各地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也加强了。苏维埃政府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用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是一切革命任务的中心。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

第二是苏维埃区域猛烈的扩大与进一步的巩固。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赤化了建宁、泰宁、黎川、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最近东方军的胜利，又从福建的龙岩、新泉交界，经过连城、清流、归化，一直到闽北的延平附近，这一大块区域，都变为苏维埃版图了。江西在粉碎四次“围剿”中扩大了南丰、宜黄、崇仁、乐安、永丰、新淦等县的各一部分，面积占数百里之广。至于中央苏区以外的各苏区，如闽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虽然有小部分地方暂时被敌人占据了，但有的不久即恢复，有的更有了新发展。发展得特别迅速广大的，是四川北部新创造的那个苏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不上一年已赤化了十多县，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都倾向着苏维埃革命。其他在陕西、河南、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等处，都有我们的苏区或者游击区域存在着。甚至被国民党出卖给日本

帝国主义的东三省境内，也已经有了我们的红色游击区域。东三省广大的抗日义勇军部队，是在继续的顽强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着。

苏维埃区域不但扩大了，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比如过去执行阶级路线不明确的现象，现在一般已经纠正。劳动法的切实执行与新的劳动法的颁布，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更加改善了，工人参加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工会普遍的组织起来并发展起来了。查田运动的广泛开展，给了苏区残余的封建势力以最大的打击，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劳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泛的发展了贫农团。依靠于工农群众积极性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新的工农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隐藏在苏维埃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加改善，苏维埃更加与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苏维埃行政区域今年已经划小，这样在制度上使苏维埃更加接近于群众。根据于过去苏维埃选举运动及苏维埃工作的经验，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选举法与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使今年的选举运动更加正确的开展起来，使地方苏维埃组织更加完善起来。所有这些，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适应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而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由于红军的伟大胜利，苏区的发展与巩固，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强占东三省、热河与华北，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浩劫，影响了激起了国民党区域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士兵与革命学生一致的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地主资本家，革命的斗争在全中国广大区域发展起来。全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因为只有苏维埃与红军

才是真正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的政府与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第三是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的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苏维埃已在用极大的力量去进行。这里发展农业生产是第一个任务，由于今年春耕夏耕中苏维埃领导的正确与广大劳苦群众热忱的提高，使今年的秋收平均比去年增加了一成半，杂粮生产更大大增加，犁牛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社亦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只有依靠农业生产的发展，才保证了红军与群众的给养，保证了与外部工业品的交换。发展工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任务，这里农具与石灰的生产，是与发展农业生产密切相连的，许多日用手工业品的供给，是依靠苏区自己的生产。烟、纸、木头、夏布、硃砂、樟脑等项的生产，过去都是出口大宗，但是后来衰落了。今年以来，苏维埃对于这些工业已在计划恢复，有些已得到了初步的成绩。发展出口入口贸易，是经济建设的第三个任务。今年以来，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经开始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为了实现上述各项经济建设的任务，合作社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自从中央政府着力提倡合作社运动以来，各地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已在风起云涌的发展中；各种生产合作社亦在计划发展；信用合作社则在开始计划。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事业，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发行超过了三百万，大概五百万的数目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得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同志们，一齐努力呵！

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亦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农群众才有享受

教育的权利与可能。一年来苏维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已在着力的进行，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已在各地广泛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与红军大学的建立，工农剧社与蓝衫团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苏维埃文化建设事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阶段中。中央政府最近已宣布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央政府正在制定小学教育制度与颁布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要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部分。

全体选民同志们，上面我们已经简单的报告了一年以来革命发展的形势与苏维埃工作的进步与成绩。现在我们还要向同志们指出过去苏维埃工作的不足与今后工作的任务。全体选民同志必须在苏维埃正确领导之下，用全力来充实这些不足，实现这些任务，才能争取五次“围剿”的彻底粉碎与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些什么呢？我们的不足在何处呢？

第一是扩大红军。同志们，我们的红军虽比从前扩大了，但是还不够，要打败五次“围剿”中很多的白军，还要大大的扩大红军，每个勇敢的工农都应该自动的上前线去。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同时为了保卫地方，必须大大的扩大赤卫军与少先队，扩大赤卫军、模范营与模范少先队，放哨查路条的工作要特别严密起来，不让一个敌人的侦探混进苏区来。运输队要时常准备着，以便上前线抬伤兵、运胜利品。

第二是新苏区工作要更快的开展。一年来发展的新苏区虽多，但是还觉得慢一点，这里一个原因就是中心区还没有选派更多的工农积极同志到新苏区去做工作。为了在粉碎“围剿”战争中更加猛烈扩大新苏区，中心区的同志要大家欢喜到新苏区做工作去，新苏区的同志更要百倍努力于自己的工作。

第三是一年来苏维埃建设工作有极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工作须待于今后的努力。首先是保护工人的日常利益，要把劳动法更加普遍正确的实行起来。其次是查田运动，要在那些还没有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地方，尽力的发动查田，查阶级运动，不得侵犯中农，不得把富农同地主一样看待。其次是经济建设。要努力今年的冬耕，准备明年春耕。要发展合作社达到一百万社员入社，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各级总社，实行做起生意来。要实行发展出入口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食盐的困难。要修理桥梁、道路，使经济发展得着便利。要切实推销三百万至五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为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资本。其次是文化建设。要建立完备的小学教育制度，要发展消灭文盲的运动。其次是加紧肃反，不使苏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乘着敌人的进攻在我们内部捣乱。其次是加紧筹款，使战争经费得着保障。

为了迅速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保证了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

全体选民同志们，所有这些工作，每件都是我们的战斗任务，都是粉碎五次“围剿”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当着我们向你们作报告的今日，正是敌人用其全力大举进攻，我们集中力量向这些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战争是极度的紧张着，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极度的紧张起来。中央政府已颁布了战争的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用突击的精神去开展自己的工作，要使整个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前线的要求。凡我选

民群众，都要在中央政府这一号召之下，立即动员起来。同志们，我们用这样的工作去换取最后的胜利吧！首先要换取一个伟大的胜利，使之在现于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前。同志们，我们拿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去献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吧！

猛烈扩大红军！

猛烈扩大苏区！

战斗的发展苏维埃建设工作！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第二次全苏大会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央政府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 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①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下列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 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各在该线不得控置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本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 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政治犯。

(四)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如民众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 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

之准备。

(六) 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 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 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 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 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 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存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 潘健行^{〔2〕}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 徐名鸿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红色中华》
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即潘汉年。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九三三年十月)

毛 泽 东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

*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 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无土

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 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 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 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中，党的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便是新区边区工作。在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后，在这方面有了转变。但是一般的来说，转变还是很迟缓的，并且在整个中央苏区之内，在一省或一县之内，转变是很不平衡的。例如闽赣、粤赣在中央苏区内是更落后的，宜乐崇在江西是最落后的，泉上、彭湃在福建是落后的等等。我们的党、苏维埃、军事机关、少共、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为着加强对于革命战争的领导，为着巩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阵地，克服新区边区的落后，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中央局重新郑重的把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任务提到全党的前面，并给以下面的指示：

(一)

为着彻底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广大的贫农中农和农村工人群众，发动和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为苏维埃政权

而斗争的积极性，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新区边区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环。这首先要排斥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新区土地一次分不好的，开始没收分配的时候，只能马马胡胡的解决。”现在许多新区边区的土地问题，表面上解决了，实际上大部分没有解决，这种观点实给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观点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把没收分配土地当作新的领土占领的第二天就应该着手作的事情，而慢慢的去进行（如东方军在闽西）。以后凡苏维埃旗帜插到一个地方就应该立刻着手没收分配土地。

在坚决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真正做到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到贫农、中农、雇农的身上，不让一个富农分得好田。但是新区边区地方党部红军中政治部，过去以及在最近在闽西作了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错误，如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江西闽赣），原耕不动（闽赣流行“原耕为原则”的口号，此外崇仁和闽西少数地方），分配的时候以收获量为标准（闽赣），闽西分谷子不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而采用四六分甚至补工钱和肥料费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崇仁、店上）山林竹木是主要出产并且操在地主富农手里，我们没有没收分配，此外还有以房为单位来分配的。上述实例，都是明显的富农路线或其残余，同时是新区边区解决土地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的错误。另外一方面，个别地方提出“贫农分上田，中农分中田”的侵犯中农利益的口号。地方党部和红军中政治部必须开展反对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斗争，同时纠正一切“左”倾的错误。在少数新区没有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必须立刻没收分配，而一般的新区边区更须切实的开展查田运动。要严格的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那里有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明确的阶级路线。同时中

中央政府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1〕}、《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最后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两次决议，都给了执行土地革命法和查田斗争以具体的指示。

豪绅地主和富农的政权虽已被推翻，但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必然要用尽一切诡诈伎俩来保持自己的剥削地位，如威吓贫农中农不许分田，保持“原耕不动”，如在闽西提议把地主富农的谷子交给政府不分，以阻挠群众的发动，在黎建资一带，他们混入苏维埃，把自己的田当作公田不分。特别当我们的政治宣传还未深入，群众还未广泛发动起来的时候，豪绅、地主、富农更要利用我们的弱点来遂行他们破坏阻挠的阴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依靠自己在农业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中的深入的工作，很警觉的揭破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阴谋。领导土地斗争的组织（如没收分配委员会等），必须保障是积极的雇农和贫农占主要的成分，绝对防止被富农地主或其代理人混进里面。

没收分配土地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采取自下的平民式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要发动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自动手来参加没收分配的斗争，只有依靠雇农和基本××××^{〔2〕}的发动，才能得到彻底的土地斗争的胜利，可是许多新区边区的乡革委或“查田委员会”把派人调查户口、田地和阶级当做中心工作，而不宣传鼓动群众起来参加。在闽赣有些地方，由革委派出突击队去调查，把田地分派给群众，以至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脱离群众由工作人员包办的方式，不仅不能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有时反而被他们利用着在群众中进行许多武断的宣传。在没收豪绅地主财物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发动群众参加没收并且当场分配给群众的地方，群众积极起来报告隐藏的豪绅地主；反之，有些地方打土豪不分给群众而搬到区苏、乡

苏甚至被工作人员私分的地方，则群众不愿报告隐藏的地主土豪。所以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

土地斗争既然是新区边区工作最基本的一环，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那就绝不应该像有些新区边区一样，只看作是土地部的工作或者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党必须领导着革命政权和革命的群众团体，特别是少共、工会一致的为着彻底的迅速的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在新区开始土地斗争的时候，应当组织没收分配委员会领导没收分配。分配完毕，应当紧接着立即组织土地检查委员会，进行查田查阶级，以便土地问题经过这样的紧接着的步骤得到彻底的解决。至于某些新区边区土地问题已经过初步解决的，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彻底的查田运动。自中央和中央政府把查田运动提到整个的党和苏维埃前面以来，新区边区仍然没有能够及时的迅速的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局特再唤起各省委和边区新区党部为党的两次查田运动决议而斗争。

（二）

中央曾经郑重指出“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工会工作所以落后于工人积极性和党的其他工作的发展，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彻底实行劳动法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业上遭遇了某种程度的忽视。这种情形在新区边区表现得更为严重，许多新区边区的党里面，发现对于工人力量估计不足与对于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许多地方，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只有形式的机关（闽赣），工人经济斗争没有发动，劳动法没有切实实行。甚至最近福建省工会的代表在连城

主张减少工人工资，闽赣党的干部中有人认为“工人情绪很低，店员靠不住”，因此没有什么经济斗争和工会工作可做。因为这种原故，边区新区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战争动员和土地斗争中没有相当的表现出来。党里面工人成分特别的少，只有少数的城市见到相反的情形，如门岭、建宁的工人曾经多次武装起来保卫苏区，实行与敌决战。最近洋口有七百余工人加入红军，这正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积极的组织和领导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展了政治的工作，为着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发展工人群众积极性，提高他们在土地斗争、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各个战线上的领导作用。必须在新区边区的党内坚决开展反对对工人力量估计不足和对职工运动机会主义消极的斗争，把“不让一个工人站在工会之外”、“不让一个工人没有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当作日常战斗的口号，谁不为这口号斗争，便该把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谁。

(三)

在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没有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权的机关，革委大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坚决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武装群众，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使临时的革命委员会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闽赣省委八月份报告说：“政权机关改造仍没有多大成绩，肃反后仍有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内，改组的几个县委仍没有工作能力，区乡更糟”。连城八月报告谓“革委主要工作是没收土豪及与土豪代表接头”。最近与敌人残酷决战的当中，边区新区革委中时常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反水的事情。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很久很

久甚至十几个月，还没有成为苏维埃。为要巩固临时的革命政权并使这个临时的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列各项：

一、应当严格选择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在革命委员会之内，“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其在军队中或在地方民众中有影响的分子不得不让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加入后如果不能在革命委员会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从第一天起我们便须设法使他们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时候，把他们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国际路线第二本九九页）。估计到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并不能“绝对保证党的训令的执行”，有些革命委员会中潜入了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有革委而无党员的，特别是最近敌人阴谋破坏革委的手段更加巧妙，如他们在红军未到时即组织革委，当红军政治机关表示对革委成分不满，他们即自动改组等等，都证明上面这一指示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我们地方党部和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最严格的选择革委的成分，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或来历不明的分子混入革委，在革委里面，必须保障组织上政治上我们的党的绝对的领导。

二、革命委员会必须积极的领导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工人经济斗争，解决城市贫民的要求，组织城市和农村的工会，组织贫农团，使他们成为革命政权的柱石。同时把群众武装起来，利用一切新式的旧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

三、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进行肃反的斗争，依靠于政权武装和群众的力量，残酷的镇压反革命。

四、“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权。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

民) 兵士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同上九九——一百页)

五、地方党部必须加强自己对革委的领导，因此要派得力干部到革委工作，并建立革委中强固的党团，经常检查革委中党员的工作，听取党团关于革委各部门的工作报告，给以具体的指导，必须保证党团绝对忠实的执行党的一切政策和训令。闽赣省委报告说“整个说来党对政府工作领导极为薄弱。在县及某些区，党的负责同志可以包办一切，而政府主席如菩萨，大多数区委及支部则对政府工作不理”。党对政府工作“包办”或“不理”的两个极端的现象，不只闽赣才有，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四)

“已下台的剥削者，本来不料他们会下台的，本来不相信这个，本来未曾想起这个，于是就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奋斗为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国’”(列宁)。当其我们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没收地主阶级打击了富农以后，无疑的要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反对我们，企图推翻革命政权，恢复他们的统治。特别是我们正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尤其特别的是新区边区在这种形势下所处的严重的环境：那里革命的政权还刚才创立或极不巩固，而反动统治还未彻底摧毁，包围我们的敌人的武装时时向我们袭击，他们极力组织法西斯蒂和各种各式的暗探机关，反革命组织等来与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勾结，组织复辟。我们不仅要武装的反抗外面的进攻，我们同时

要极警觉的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如果放任内部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将不可能战胜外面的敌人。

七八月间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在黎川资溪光泽破获了大批AB团和改组派的组织，使闽赣苏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前面消灭了暴动阴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那里发生肃反中心论倾向，省委已在纠正）。可是我们冷静的检查大部分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便发现那些地方的党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是很不够的，因此，肃反的工作是松懈的，赤色戒严和步哨没有严密的组织起来。敌探以至武装团匪可以没有阻碍的深入苏区数十里，区苏或区委时常突然的被袭击包围，游击队、政权机关以至党的组织内时常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反水。但我们没有事先觉察，对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与造谣多不注意及时的揭破，有时造成群众中的恐慌，而我们反莫名其妙。这些严重的现象，客观上表现了对反革命“仁慈”的倾向，我们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残酷的斗争，战斗的加强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以群众的暴力“坚决的肃清反革命阴谋，彻底的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一、首先重要的是加强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肃委的领导必须是对革命最忠实的并且对肃反工作比较熟练的干部充当。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须创立这个组织。

二、在肃委中和其周围，必须吸收当地工人贫农中最坚决积极的分子参加工作，经过他们建立与广大劳苦群众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肃反工作将不能开展起来。

三、扩大保卫队的组织使之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组织严密的步哨和赤色戒严。

四、要广泛的采用群众的革命的手段来处置反革命。对付反革命必须采用暴力，这种暴力要依靠在革命的劳苦的群众身

上，而不是依靠在几个工作人员的搜索与专断。对于显然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反革命首领，必须经过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由群众处决而不要机械的经过合法手续。

五、对反革命的武断宣传和造谣，一方面要及时的揭破，另一方面就要追求其线索和来源，达到破获的目的。

(五)

部分苏区群众被反革命欺骗或威胁因而转到反革命影响之下的，有两种情形：跑到白区去；加入大刀会、难民团、守望队、童子团等。两种情形都在反革命领导之下，并且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加入，这些于我们是敌人。唤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影响威胁之下的群众。

跑到白区去的群众有两种情形：一是当敌人进攻时，群众未及走避被敌人押去白区；一是平常跑出去，由于阶级斗争不深入，有的由于工作方式（如强迫命令）或策略（如侵犯中农利益等）的错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欺骗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跑到白区。跑到大刀会等反革命组织中去的，也有这同样的情形。

此外，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在邻近白区“乱打土豪”侵犯白区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至在许多地方造成“赤白对立”的城垣，敌人便利用这种错误。闽西十九路军被红军击退时，拿“土共来了，扫帚也要××”的口号威吓成千成万的群众跑去敌人的后防，并且扩大童子军的组织。

反革命首领对于跑到白区或大刀会等反动组织中去的群众，除掉欺骗外，就是威吓强迫他们进攻苏区或修筑工事马路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跑往白区的群众是容易争取回来的，大刀

会等反动组织里面的群众也是可以分化出来的，闽赣省的光泽资溪曾争取了两万多跑去白区的群众回来，群众回来后积极带路捉反动领袖，就是极好的例证。

但是有许多地方，我们的地方党部和地方武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有的没收跑出去的劳苦群众的财产，新泉、芷溪竟发生没收被胁迫去白区的红军家属的财产。对大刀会只是单纯的采取围剿，石广游击队甚至认为凡是大刀会地方都是匪巢，凡是匪巢都无条件的烧杀没收，群众的纸槽、香菇棚一概毁灭。这种国民党式的政策，使大刀会首领更能欺骗一部分纸工、木排工和香菇工人，拿“打下山去，不打红军苏维埃，只打游击队”的口号煽动群众。湖坊、熊村赤卫军将捉了的大刀会群众“乱打乱杀”。闽赣有的地方，当群众争取回来的时候，要他们向苏维埃悔过，同样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政策，仍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把一切暂时被反革命欺骗或跑往白区的劳苦群众当作“反水群众”，不了解群众是不会反水的。反革命领袖是一方面，在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又是一方面。前者是苏维埃的敌人，后者完全可能成为苏维埃的拥护者。所以反动领袖不得不向群众说“大红军好”，“不打红军苏维埃”，正因为群众是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另外一种错误就是东方军政治部×××××首政策”，希望真正反革命分子×××这种政策，实际是反映着对反革命首领妥协的倾向。

我们必须在严厉的反反对一切对反革命妥协的倾向的时候，无情的打击不相信群众的“反水群众”的理论，纠正地方党部游击队等所犯的“左”的政策上的错误。

估计到成批的群众跑去白区都有反革命分子从中威胁煽惑，必须在×××时候，进行严密的肃反工作。估计到大刀会、童子军等是一种反革命的武装组织，必须加强地方武装

(赤少队、独立团等等)，坚决对这些反革命武装实行群众的武装的进攻，严厉打击类似过去合泽的同志在建黎泰所执行的防守政策。

估计到一切反革命首领常常提出巧妙的欺骗口号来煽惑群众，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的从实际例子中去揭破那些欺骗宣传。估计到反革命首领的欺骗口号，一部分是利用着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严格纠正自己的错误，以至向群众公开承认这些错误，用实际的事例去说服群众，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影响而转到我们方面来。

对于跑去白区的或加入反革命武装组织的劳苦群众，不仅要采取各种各式的方法去宣传他们回来，不仅不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危害他们留在苏区的家属，并且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同样要分配给他们××他们回来分田。对于反革命的首领××××××劳苦群众，也要同样待遇。这样才能使这些群众完全了解苏维埃是保护他们利益的，是他们自己的政权。

游击队应当是苏维埃种子的散播者，新的苏维埃的组织者，必须严格的执行党和苏维埃的政策，坚决肃清游击队中“土匪主义”的倾向，如乱打白区劳苦群众，以及脱离群众的倾向如没收豪绅地主财产，不分给当地群众，不组织当地群众斗争等。必须这样，才能根本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

估计到争取回来的群众，他们曾经受过各种各式的反革命欺骗，我们不仅要发动群众以极热烈的诚恳的态度欢迎他们，慰劳他们。被我们缴械的大刀会等反革命武装组织，除开把首领交给群众审判处决外，对于群众不仅不要杀害他们，同样要安慰他们。我们更要向这些群众尽量揭破反革命首领的罪恶，解释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组织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肃反工作和继续消灭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六）

三次战役中赤少队、游击队英勇的作用，而在四次战役中“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斗争》二十一期第三页）。这种现象自然最厉害的表现新区边区。依据于环境的需要，新区边区的赤少队游击队应该表现出最高度的积极性。但事实恰恰相反，那里的党部很多表现倚靠大红军的心理，“大红军不在，一切没有办法”。现在的状况是四次战役来发展的新区，赤少队极少真正建立起来。比较老的边区和新区，赤少队大部分表现出没有自卫的能力，调动着去配合红军作战，则发生开小差和逃跑。

地方的游击队（除开红军直接组织领导的）的现状是很严重的。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一）游击队不仅很少扩大，反而日渐缩小；（二）时常发生开小差或拖枪反水，特别在敌人进攻紧急的时候；（三）不敢出击，伸出即回；或者游而不击，击而不游；（四）出击时“乱打土豪”，没收不分给群众；（五）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在队伍中，甚至担任领导工作；（六）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上述的现象在部分的独立团营也同样存在着。

在会寻安方面，虽在敌人积极进攻的环境中，无论赤少队和游击队都没有什么改善。其他地方赤少队一般是没有改善，在闽西和闽赣少数地方游击队有极微弱的转变。

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严重的向全党提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党“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

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与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为着使地方党部、政府和军事机关能战斗的解决这个任务，中央局曾经发出关于赤少队的指示（《斗争》二十八期）并准备发出关于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专门的指示。边区新区的党，必须在中央关于五次“围剿”决议的总的路线之下，遵照右述个别的指示，在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方面执行切实的转变。

（七）

为着解决上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必须在新区边区党内开展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改善党的领导方式。

一、因为罗明路线的损害，曾使新区边区工作陷在严重的落后的地位。直到最近反罗明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一部分新区边区，如宜乐崇、安远、寻乌、南丰、新淦、信丰、闽北、武平等地方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展。那些地方不是没有“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退却逃跑的呼声”，而是“反对”只限于“空喊”，没有具体的联系到实际工作的转变以及领导机关的真正的改造。所以新区边区的党，首先最重要的是坚决的肃清罗明路线，反对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把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口头很漂亮的反对机会主义而实际忠实的拥护机会主义的两面派，向着清谈两条战线斗争而与实际工作转变脱离的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对于不能立即解除自己反党武装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人，必须从领导机关中撤换，代以新的领导，保障每个党部苏维埃武装

队伍和群众组织的领导都能绝对执行党的路线和上级机关的指示。

在坚决进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必须顾及到新区边区的党比中心区要年幼得多，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特别是年轻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的时候，要充分采取同志的态度而耐心的去说服和解释，具体的指出正确的方法，特别要能作出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所指示的正确。然而这并不减轻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在进行着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这就是说“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指示的执行以及与居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对于游击队和红军中的党更特别重要。党员领导的队伍，应当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在事实上实行为反对违反苏维埃法律的罪过之每个党员的最严厉的个人负责办法，党员比非党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恰恰相反的，说服解释的工作更能提高党员对于革命纪律的自觉的责任心，所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关于这点，（即上面的引文——作者）必须向党员和同情者进行解释工作”。

二、必须把争取党员数量的发展和创立新的支部当作组织上的重要战斗任务。有些新区边区经过几个月以至大半年的工作，党的组织还仍然极端窄狭，有些地方根本只机关工作人员中有党员，没有地方支部。为着解决这个战斗任务，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办法，如责成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特别是接近群众的工作的党员，经过他们自己的工作路线去介绍党员，给每个这样的工作同志以具体的征收党员的任务；责成支部每个党员介绍新党员，经常把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到支部中检查和讨论；在没有支部的市镇和乡村等，指定专门的同志去担任建立支部的

责任。在新区边区的环境中要尽力的扩大关于共产党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什么，但党员的吸收，必须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采用个别征收的办法。群众大会上摆摊子式的报名入党，就在中心区也是坏的办法，如果拿到新区边区运用，是更不适宜的，因为容易使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里面来。

三、为着加强新区边区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执行“最好干部到新区边区”的口号，不只中央和省委要担负这个责任，县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区，区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乡都要严格的执行。同时对于调去新区边区的干部要尽可能经过相当的训练，给他们以初步的关于新区边区工作的策略和方法的知识，不然他们会机械的把老区工作方法搬到新区边区，不能接近群众，或则在新区边区许多特殊的以至困难情势的前面，表现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必须培养与训练当地干部，这不只因为外地干部不能满足需要，主要的还因为没有大批的当地干部逐渐提拔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地位上来，党与群众的关系很难达到应有的密切。必须粉碎新区边区党内特别是外地干部中不相信当地干部力量的倾向，坚决提拔在群众中有信仰而积极工作的党员担任适当的负责工作，耐心的给他们训练和帮助。

四、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自己干，否则只有强迫命令。另一方面，组织上的基本原因就是群众组织狭窄，并且多半只是有空机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开始组织，

因此党与群众之间缺乏“轮带”与“杠杆”，没有动员群众的工具。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群众组织。组织强大的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是转变新区边区党的领导方式的基础，是在残酷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

中央局责成各省委，边区新区的县委、区委详细讨论这一指示信，并且在支部中作报告。省委、县委须将新区边区工作转变情形随时报告中央局，关于新区边区的白区工作，另有单独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2〕此处符号是原有的。下同。

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同志：

除了我们给你的口头的指示以外，我们要再来一次着重指出关于福建最近发展的主要点。

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之间的协定大大超过仅只停战的范围，因为协定所载的除停止冲突外，还有重要的政治的条件，如开放封锁，应许福建白区群众有民主的权利，释放政治犯，群众有武装自己之权及其他要点。赤白区疆界的划定更加确认我们以前取得领土上的胜利。但该协定至今彼方尚未批准。

我们必须绝对明了假使被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批准这个协定，他们也决不会执行的。党在这一点必须坚定如顽石，必须从开始就在党内和群众中克服任何的幻想。

(1) 为什么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不愿和不能实现这个协定呢？因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因为十九路军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

因此，他们的压迫工农的政策会继续下去。他们不会分配土地给农民；捐税反会增加，他们要维持和增加剥削；政治犯不会释放的，或者当部分政治犯释放时，新的被捕者又再充满

牢监；他们不会让群众来武装自己而是要继续他们解除游击队的武装的企图；进攻苏区的军事准备不会停止，而是在我们不大顺利的形势和十九路军比现在集合更多力量的时候他们还要实行进攻我们的。

(2) 那么，为什么十九路军首先发动要和红军缔结协定呢？

仅仅拿十九路军军阀想借此削弱我们的戒备以便后来更好在我们背后中伤我们的意义来解释这样一个步骤是不充足的，因为十九路军领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信任他们。对这问题的答复是在于，因为中国反革命的营垒中有深刻的和不断地增加着的矛盾。矛盾的增加是由于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矛盾的深刻是由于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矛盾的加紧是由于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由于要在中国民众身上打出一条出路的帝国主义者中间有不断增加着的敌对和冲突，由于中国剥削者和军阀们之抢夺之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据地更加狭隘的缘故。这种发展并不会减少中国剥削者破坏工农的革命之残酷的企图，而是要增加反革命者屠杀中国民众的努力，同时又发生十九路军领袖们首先要与红军订立停战协定的事情。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除了上述的几个基本理由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特殊的条件。

十九路军在今年夏季与红军作战时，大大地打败了，当在上海战争时期，十九路军取得了有坚强民族革命倾向之有力的战斗队伍的声望。但十九路军军阀的领袖们害怕民族革命斗争的结果，害怕他们的士兵和群众，勉强接受了蒋介石强迫十九路军迁移到福建的命令。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要十九路军离开蒋的地盘，将他放在苏区、海洋、广东和浙江中间之相当穷苦的省份，利用它来进攻红军，放它在有日美帝国主义间紧张的

敌对之区域里面，盼望十九路军在未来的争斗中会失去它的特性而毁灭其战斗的力量。在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帮助之下，蒋介石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达到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改编”了他们的队伍，解散和屠杀活埋了革命的士兵，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他们军队的战斗力量由于铲除民族革命成分而减弱了。他们如其他军阀的部队一样成为执行帝国主义的阴谋的势力。他们初入福建时，广大群众欢迎他们，视为解放他们脱离封建军阀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救星。今天的群众则痛恨他们，因为他们已成为服务剥削者和增加福建人民担负的武力。蔡廷锴和上海战争的其他“英雄们”在意识上和政治上已破产了，他们的军事的魔力已受到红军的严重的打击，他们已经失去了发生为“中国的救主”的单独的作用之前途，他们害怕蒋介石的胜利以及由此胜利而得的处置，他们更害怕红军的胜利与苏维埃革命扩大到大部分的福建。

在这个进退两难之中，十九路军中若干领袖和政客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再得比较广大群众的信仰，企图加强他们反对蒋介石广东和福建内敌视的军阀的队伍之地位，提高他们与现在或将来的南京政府妥协的价格。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才觉得与红军谈判停战和缔结一个协定是与他们有利益的（他们在缔结协定上并不是完全一致，推迟批准协定和福建进一步的事变，至十一月半尚未宣布他们的倾向等就可证明这一点）。在形势中每一个变化，红军有不大顺利的形势或有伟大的胜利，阶级斗争之残酷的发展和十九路军士兵之革命化等都要使十九路军领袖们完全改变态度，引到对苏区新的进攻。我们的全党必须要明了这个，因为我们必须预先准备。我们方面任何的忽视，将要引到重复以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这个错误，党和群众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出了最重的代价。

（3）对于十九路军领袖们既有这个估计，那么，为什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再要与他们缔结休战协定呢？

我们主要的理由是增加敌人营垒中的对抗和进一步的瓦解，在与蒋介石主力进行最剧烈的战斗时至少取得与一个敌人暂时的休战，如有可能取得一个暂时的甚至于仅只部分地开放封锁。最后，如果党能利用的话，可以对于发展福建白区中工农之革命的斗争上给予以较大的兴奋，加速将十九路军士兵争取过来参加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

（4）为了要完全实现这些目的，福建的党要担负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不必指出已与你面谈过的一切任务，我们仅只着重举出几个主要的任务：

（甲）必须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一切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性，必须使群众了解在福建内的发展，团结他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斗争。

我们必须晓得中国生长着的革命，国民党之增加着的瓦解和腐烂必会引到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军阀以层出不穷的新的企图来欺骗群众，用武断宣传的阴谋和增加的武力来制止革命的胜利。法西斯蒂的活动是在增加着，他们的目的是拥戴蒋介石做羽毛丰满的独裁者，以便他更加残酷地进攻革命，克服国民党和军阀之不同的集团，将中国比现在更高度地放在日本的控制和宰割之下，使中国在将来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中站在日本方面。这种法西斯蒂增加的活动，表现出为中国尖锐的革命形势所产生的发展之一方面，这个革命形势是在引到敌人营垒中进一步的瓦解。促进国民党瓦解的其他方面是反对蒋介石者正在增加，各个破产的集团和政客们更要企图以“反对蒋介石独裁”、“建立民众的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平均分配

土地和土地国有”等口号来挽回比较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信仰。北方冯玉祥和他的部下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当察哈尔工农兵运动被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卖国行为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北平、南京的日本傀儡之炮火所破坏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利用冯的把戏和国民党的卖国而进一步地巩固其在华北的侵占。

福建事变大半是与北方的运动一样的。“第三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诸集团，现在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壁以阻止革命的怒潮。他们看到国民党更加瓦解，估计到目前南京政府濒于倒台，所以在工农开始建立他们的苏维埃的时候，他们就举起他们老的反革命的旗帜。为了要将群众把持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之中，为了要拦阻群众走向他们的先锋队所指示的革命道路起见，这些企图采择了冒充的民族革命和武断宣传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词句、口号、政纲。在欧美各国学得了一些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齷齪的方法之留学生也加入了这些集团，共产党的若干叛徒们也来加入他们的营垒。可是不管有扩大组织和活动的一切企图，他们依然没有进步，瓦解仍然进行。

现在这些领袖们目前形势或可扩张他们活动的范围，增加他们的力量，供给他们以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力量及比国民党更有效力的方法。无疑的是，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之力量之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因此，我们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础上竭力和这些政党奋斗，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我们必须更清楚地明了福建最近的运动又显明地表现敌人营垒中每个集团都被拉入帝国主义的利益和阴谋之轨道上去。事实上，彻底反动的胡汉民企图在福建运动中要起领导的作

用，所以他已被杉村高度地赞扬为日本可信托的人。这表示至少一派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手掌之中。我们能够推测积极发动目前运动的陈铭枢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但即使陈铭枢没有参加这派，然而十分显明的是他至少在客观上已起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因为这些福建分子并不要想进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握在手掌之中。毫无疑问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要企图将它的脚爪抓入福建肥肉的更深一层。

报纸所载的一切，表示福建敌人营垒中发生进一步地不相一致。这个不一致的理由是有好几个：不大相信他们计划会成功的，不赞成对苏区红军的态度及与他们订立临时协定；对内政策的执行和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倾向亦有不同的意见，无可怀疑的是蔡廷锴倾向美国，所以福建军阀营垒中的矛盾也反映出美日间的尖锐的对立。

因此，我们的党必须要坚强地和清楚地将革命的立场放在群众面前，必须彻底告诉每个党员担任这个工作。

（乙）党的组织任务是有同等的重要，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例是：假使我们获得一个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之最短时期，党的机关和党的最重要负责干部必须保守严格的秘密，领导公开的群众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当敌人忽然反脸进攻我们的时候，他也决不能消灭我们的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最大的谨慎会保存我们许多同志来做将来的工作。党的坚强的省委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来。

（丙）但是与这些预防的办法同时进行的是要在一切活动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开展可能的群众工作，必须吸收可靠的工人贫农和其他劳动者来进行加强党的组织和建立新的组织。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发展起来，团必须竭力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利用临时协定的事实，利用士兵们的不满，利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用十九路军领袖们和福建政府的卖国等等。必须在十九路军和其他队伍中建立小组支部之严格地秘密工作，主要的是派遣党员和团员深入十九路军，必须组织赤色工会，巩固现存的工会。我们必须在群众附和敌人及敌人占优势的工会内加紧我们的工作。工人目前的要求必须放在前面，但这些要求必须要与中国政治形势、福建的各种发展、反帝斗争和发展斗争来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联系起来。必须组织工人纠察队，建立行动委员会，准备和领导罢工。

一个广大的反帝群众运动必须发展。不仅要鼓动，主要是由鼓动而建立群众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工人在这运动中要起领导作用，且要没收日货，将日货分配给失业者和城市贫民。

农民中的工作是极重要的。组织农民委员会，以农民委员会为抗债、抗租、抗税、夺取收获的粮食，夺取和分配地主豪绅富农的土地之斗争机关，利用福建政府平分土地的允许来粉碎它的假面具和发动农民自己的行动。只有农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土地革命，要拿武装来支持农民斗争。因此要在党领导之下或在可靠的贫农中农领导之下组织武装的“农民自卫军”。

派遣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这个运动要超过现在或将来福建统治者或者所给的让步的范围，这种小小让步仅只为了宣传而决不会变更农村中基本群众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群众准备拿武装来支持斗争而由群众自己来改变它，也要将反日运动、反帝运动与这个斗争联结起来。农民运动将是扩大福建革命之最重要的杠杆之一。

(5) 苏维埃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之间的临时协定给予我们以号召工农兵群众的伟大机会。

如果这个协定不被批准，我们必须举行一个伟大的运动要求福建政府十九路军批准它，将它在群众面前披露出来，同时要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包含由群众自己来实现这个协定）而斗争。假使这个协定被批准的话（虽然可能性很少，但仍有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机会。然后我们必须发展斗争要求实现开放对苏区的封锁，且为实现协定中政治上的要点而斗争。无论该协定批准与否，我们必须要将为实现我们的要求（包括协定所载的各点）的斗争发展到达极点，只有福建工农兵的群众拥护，才能保证反对福建军队对苏区红军新的进攻。

不论这个协定批准与否，我们都有极大机会来揭破福建统治者的假面具来发展福建群众的革命运动到达较高的阶段。当敌人还未显然表示不肯批准这个协定之前，我们不必将协定全文刊行出去。但显明的，我们应该普遍传布一个临时协定已经缔结的事实。我们应该将协定中的主要点告诉群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号召和督促他们为批准这个协定而斗争，如果被批准了，则为实现这个协定而斗争。要普遍地宣传苏维埃的政权，告诉群众必须要武装暴动，必须组织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能解决群众的土地、粮食和自由的问题。

我们请你将这个路线和我们面谈过的其他重要任务完全执行，时常注意迅速变化的形势和新的事变。你必须用最大努力来向全党说明，纠正错误的观念，养成一个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意识，为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展具体的工作。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过早地发展地方武装暴动，而是在最短的可能的时期里面创造为工农的群众斗争之广泛的基础，将十九路军士兵革命化和领导斗争到较高的方式。然后我们会打击敌人的威信，破坏敌人的计划和目的。然后，即使敌人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仍能暂时保持重要的海港和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我们也会取得群

众的力量，在福建最大的部分的地域内推翻敌人的势力。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为“中日直接交涉”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们!

国民党卖国贼又与日本强盗进行了新的拍卖中国的交易，实现了所谓“中日直接交涉”了!

据中外各报的消息，这次交涉是关于通车、通邮、通航、通商、设关、借款、军事等等的问题。经过冈村与黄郛、何应钦，在北平数次谈判之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认为上列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结果”，而成立了协定，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 北平与沈阳直接通车，凡载客与运货所得之费，彼此平均分配。

(二) 恢复中国与“满洲国”间邮务、电报等的关系。凡取道西伯利亚与满洲之邮件、电报由中国收发，而不受中国当道之留难。开办北平与沈阳间载客运邮之航空业务。

(三) 恢复中日满的通商，禁止一切抵货运动。凡华北与满洲间商品的输出输入不标明产地，使日满的商品入口中国不付关税。

(四) 在长城各口设立税关，以表示事实上承认长城以外的土地为日本属地，而从中国运往满洲的货物得由“满洲国”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八期。

抽人口税。

(五) 日本允许以大批借款及军火供给国民党去镇压抗日义勇军与红军，作为国民党这次出卖的代价。

(六) 成立中日满的军事联盟，去进攻苏联。

这个交涉的意义，当然不限于国民党公开承认“满洲国”，最后出卖了满蒙，而且把整个的华北送给了日本强盗，以此得到日本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去进行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作为这次新的出卖的交换条件。这也就是塘沽协定中所谓“内乱戡平的援助”，亦是日本外务省“新外交方针大纲”中所谓“协力剿共”！

只有最无耻的卖国贼汪精卫辈才会说这次的交涉是什么“不丧权，不辱国”，只有最卑鄙的上海市商会才认为汪精卫这个自欺欺人的声明是什么“欣慰曷极”，只有最反动的《大公报》才会说这次的交涉是为着什么满洲“人民”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国民党卖国贼和一切反动派，为了掩饰其卖国的罪恶，大喊什么关外“人民”与关内不能无“通车”、“通邮”的关系，而对于苏区民众则实行最残酷的封锁与轰炸，在“中日直接交涉”的时期大举“围剿”唯一反日反帝到底的红军与苏维埃政权，而在全国各地实行其所谓“剿匪”宣传周，无耻的污蔑红军是什么“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的武断宣传的面目，已经在全国民众面前完全揭穿了！

现在甚至瞎子也可以看到，国民党是一贯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彻底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已经出卖了满洲、热河、内蒙、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把康藏又卖给了英国帝国主义，把云、贵、南海九小岛卖给法帝国主义，把整个的中国在所谓“技术合作”的名义之下送给国联管理。在目前“中日直接交

涉”的过程中，汪精卫经过郭泰祺实行联英的勾当，使英国扶植刘文辉在四川的势力，英国也准备以“宪兵恢复长江秩序”，直接干涉中国的红军。蒋介石刽子手自认为五次“围剿”没有把握，恭请日本出来直接进攻红军，准备以中国沿海沿江各地送给日本，以便在中国准备大战，又去对付苏联。因此，在“中日直接交涉”中，冈村和平津的历次谈话特别提到日苏的关系之紧张，满洲、热河各地的日伪军加紧训练与调动，并称苏联为日伪的敌人，这都不是偶然的。

全国劳苦群众们！“中日直接交涉”已经实现了！国民党现在正忙于执行这次交涉的卖国条约。通车、通邮、通商即将实现了，长城设关已开始进行，何应钦在平津大宴日本忠实走狗——孙传芳、曹、陆、章^[1]等，团结一切新旧卖国贼，以形成华北的第二“满洲国”。日本强盗在这次“中日直接交涉”之后，正在积极准备加紧侵略中国，要在大连设立临时政府，在中国极力备战，派军事专家调查中国各地物产、地形、道路、河流、军队、武器、炮台以及红军苏区等，以便进一步的屠杀中国民众和镇压中国革命，现在甚至反动报纸也承认：“今日之北平，即昔日之沈阳，今日之华北各省，即一九三一年之东三省”（《大美晚报》）。我们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劳苦群众们！我们不能让国民党卖国贼这样干下去！我们不能让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这样来瓜分共管中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国民党这样来镇压中国革命与进攻红军苏区！

摆在中国前面的只有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被帝国主义最后瓜分共管，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宰割之下解放出来，而成为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

劳动群众们！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卖国交涉，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协定，以罢工、罢课、示威去反对日本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五次“围剿”！反对侵犯中国民众的唯一的的朋友——苏联！我们再次声明：只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国民党，为苏维埃中国而斗争，才能使中国民众得到民族的与社会的完全解放！劳苦群众们！团结起来，武装起来，结成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血腥统治，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 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张 闻 天

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今年正月内曾经公开宣言，愿意在三个条件之下，同任何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订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的战斗协定。这三个条件就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及领土的完整。

自这一宣言发表之后，在苏维埃政府关于许多重要政治事变的宣言中曾经一再提出这一主张。最近，在苏维埃政府《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中，又重复提出了这一主张。

苏维埃政府这一提议当然不是偶然的儿戏，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这一行动是在揭破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的造谣与污蔑（说苏维埃与红军在后方捣乱，所以不能使国民党军阀出兵抗日，不能不使国民党集中他们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最清楚的在全中国民众之前表示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始终一贯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与红军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六期。

不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正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政权与民众武装。因此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争取全中国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之下，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尤其是对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与下级军官，这一宣言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同意我们的提议，愿意同我们一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压迫他们、残杀他们的兄弟姊妹的国民党军阀，他们骂他们的上级军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情形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非常普遍的。

在另一方面，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所以我们苏维埃政府向所有国民党军阀提议，只要谁真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使我们同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与相反的政治立场，即使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是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

我们这种提议完全不是我们的示弱，而是表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但是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所不了解的。他们说，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那不过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而已，难道我们苏维埃真想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订约不成！

无疑的，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由于全国的民族危机，由于他的士兵群众的革命化与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由于苏维埃与红军影响的扩大，由于他自己所处的政治的与财政经济的困境，以及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的紧张化等许多特殊的条件，这种可能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可能，而是利用这种可能，来争取群众，来取得群众的同盟者，来为苏维埃政权谋利益。

在国民党这块招牌根本破产，在蒋介石以全力造成他自己法西斯系统的独裁，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加紧，以及全国的政治经济的危机的情形之下，在国民党内部必然会发生新的分裂与瓦解。一部分国民党军阀，由于他们切身的经验，知道红军的力量是不可欺侮的伟大的群众的力量。屡次的对于红军的进攻不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兵败将亡，劳财伤命。在他们中比较开明的分子，自然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过去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敌对政策了。同时其中一部分军阀为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为要用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迷人的“左”的反革命政纲，并且可以最后抛弃国民党的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开始在相当限度内容许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并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类军阀常常不怕接受我们的条件，而且积极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好在群众前面表示他们的左倾，以争取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

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且夺取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当然，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从这种妥协，我们可以得到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東西。从这种妥协，我们还可以争取广大群众与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与我们的组织。这种妥协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容许的。列宁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对于这些人，正像列宁所说的，除了“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极端危险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有些同志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往往以为，某一军阀愿意同我们妥协，那就表示这个军阀倾向革命，表示这个军阀愿意向我们苏维埃政府投诚，相信这个军阀是我们的好朋友，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停止对于他的一切斗争，甚至说还要在政治方面向他让步。

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最危险的。这是从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老机会主义。我们丝毫不能忘记，同我们谈判的、妥协的，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军阀。这些军阀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会表示左倾，甚至会同我们暂时的订立协定。然而形势的变化，会使这些军阀立刻抛弃他们的面具，露出他们原来凶恶的真相，撕破过去他们所亲手签订的一切协定。对于这些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丝毫的幻想也用不到的。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幻想他们会变成革命者，而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们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必须坚信，只有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革命才能发展，才能胜利。那些反革命的“左”的欺骗宣传不但不能推动革命前进，而且会障碍革命的开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在个别的地方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中央给满洲省委信）

在我们苏区，则应该利用这种妥协，来流通我们的商品，来集中更多的力量去对付主要的敌人。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一妥协的时间，即使是十分短促的，加速度的去准备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预备新的决裂与新的战争。对于同我们妥协的军阀

的每一新花样，每一对于群众的欺骗与压迫，我们应毫不放松的给以揭破。任何的协定不能束缚我们党对于协定对方的严格的批评的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员，在同这些军阀谈判中应该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我们的基本原则，去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如何能够在外交的礼貌与辞令中不失去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而抓住每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空隙与机会，来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

苏维埃与红军的新的胜利，国民党的进一步的崩溃，将使这类“外交事业”更加繁忙与复杂，但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对于阶级敌人的幻想，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任何的协定不能使我们失去头脑，使我们的工作松懈下来。相反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短促的时间，更努力的工作，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去争取苏维埃革命的新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 江苏党的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

中央细心的检查了江苏党半年来（自六月至十一月）的工作，看到了工作中个别的成绩：在大破坏后的困难环境中进行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领导了一些小的群众斗争，帮助了反战大会的举行。但是，江苏的党还没有学习把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适合革命斗争扩大与生长的要求。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还不能与广大的群众组织实际的日常联系，不能在工人罢工运动中负担领导作用，没能在各工业中心——首先是在上海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没能领导江苏的农民运动。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全国和江苏虽存在与日益开展的革命形势，但江苏党不能在全省——首先是上海领导一个伟大的运动有力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的斗争。

江苏省委自大破坏后至今已经工作了半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与具体帮助之下，依靠着下层同志的积极性，本有开展工作的一切可能，然而终仍造成目前之严重局面的基本原因，不能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八期。

不归咎于××同志领导之下省委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态度

二

这一官僚主义的领导，更加强了我们落后于客观事变的严重状态，阻碍着征服我们在发展中的困难以及在全线上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进攻。

这首先表现于反帝反战的工作。

民族危机日趋险恶，引起了全国反帝的群众运动的开展。上海广大劳苦群众正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巨流。反对塘沽停战的运动，在民众救国御侮会的周围生起的反帝积极性，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之友的苏联大使的运动，拥护反战大会的呼声及大会前后的群众积极性（选举了数百个代表，东区数千人的群众反战大会，码头上的群众集会，在有些工厂和学校里的会议，作了一些抗议五次“围剿”的工作……），在这方面江苏的党是得到了一些成绩和开创了新的局面。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胜利的完成了的反战大会，应该是江苏党转变反帝反战工作的起点，但亦以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对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指示之怠工与有意的搪塞，使大会后的反帝反战工作反趋于无形的停顿，环绕在这大会周围的群众热情很罪过的任其冷淡下去。这种消极的放任政策的结果便是：（一）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三百多个代表，大部分被我们失掉，没有即刻组织起来，成为开展反帝反战工作的骨干力量。（二）大会前的群众工作是极不充分的，大会后就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克服这个极大的弱点。在一切工厂、学校和一切群众组织召集群众会议，报告和讨论反战大会的总结，以建立反帝运动的下层群众组织基础。

但省委没有动员支部及群众组织来进行这一艰苦的组织群众的工作，却向中央报告许多似是而非的事实——将赤色小组或支部用改头换面的办法称为反战团以塞责。反战大会的政治影响因此没能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三）大会后，没有注意召集各区的代表会议、选举区的反帝非战分会及把他们变成开展工作的武器。（四）由于不正确的领导，在大会上没有很好地选出执行委员会，而补救的办法是应该在各区的代表会议上分别选举，然这一工作既无任何进展。因此反战总会始终未能形成起来——就是执行总会日常事务的几个党员同志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的领导。（五）新的组织没有及时创立，而旧有的群众组织如保联、救国御侮会等又因“迎新”而大大削弱下去。这样，使党在反帝运动中的组织基础不但未能扩大而反加削弱。（六）反帝非战的宣传鼓动工作是狭隘得无以复加，即反战大会特刊至今亦未能出版。省委所发的“反战大会的总结”在党的区委和支部会议上都没有切实的讨论和规定具体的任务。工作是削弱了，反战大会的成绩没有巩固起来。中央虽一再的向省委敲着警钟，但省委本身初则是充满着凯旋和复员的情绪，不计划着今后的工作，继则躲避艰苦的顽强的工作而终于放弃。另一方面对反战大会意义估计不足与极端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创造力，而公然诬反战会的工人代表为“草包”，不足以与闻反帝的工作，种种反无产阶级的意识没有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这都表示着省委的政治领导是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没有真正了解中央论反帝运动中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的全部指示。在《列宁生活》上把这封信的基本立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事实，决不是偶然！

中央认为这封信中的基本指示依旧全部有效，并号召江苏党立即以这封信为根据来讨论目前党在反帝反战工作中的错误

与弱点，抓紧每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卖国的事实（如最近之中日直接交涉等），进行广泛的群众鼓动，揭破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开展反帝和国民党的斗争。为此，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和每一个党员在最近必须执行下列的几个工作：

（一）在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来建立各工厂学校的下层反帝非战组织，区的分会，省委应帮助区委、支部来筹备各工厂、各学校的群众会议及区的代表大会，并动员团、工会来共同进行这一工作。

（二）立即成立远东反战大会总会办事处，团结各地的反战代表并吸收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参加工作。省委应保证派遣得力的干部，以便在总会内形成强有力的党团。总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正式形成后，办事处即解散，其工作人员转入总会继续工作。

（三）省委应帮助办事处立即起草反帝非战的总的行动纲领，并分发至外地及首先保证在上海各区对于这一纲领之广泛的讨论。

（四）党、团、工会应在准备着将上海码头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警备委员会的问题及在纱厂、丝厂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加入远东反战总会的提案。

（五）反战与反对法西斯蒂是不可分离的。近来蓝衣社的盗匪们更加疯狂的蠢动起来，江苏党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揭破法西斯蒂的真面目，揭破他们所主张的“文化统制”等，来团结广大群众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到处组织反法西斯蒂大同盟。

（六）白区党工作的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党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在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护苏区，有力的帮助粉碎国民党对于工农红军的“围剿”（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的决议)。在这里，要极端反对把反战反帝的工作与冲破五次“围剿”的任务隔离起来，省委本身对这些工作的相互联系既自承认没有“了解”，而下层的同志根据东区巡视员的报告则更是“顾此失彼”，抓不到主要的一环——组织群众，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江苏的党应克服这个最大的弱点来开展拥苏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发动抗议五次“围剿”的工作。

江苏党应该了解，在整个反帝的土地革命中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处在这一个全国无产阶级的首都——上海的布尔什维克负有特殊的使命，他在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事业中的每一成功都将增加着整个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要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首先就要依靠党的领导怎样领导全体党员和赤色工会面向企业来进行工·会·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央认为正是江苏党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也正是江苏党今后转变自己全盘工作的起点，这是考察江苏党面目的主要尺度。

中央认为江苏省委没有推动每一个党的组织来注意工会工作，而把工会工作只认为是工联的工作，对于工联的工作又不给与有系统的具体的领导，这使我们不能抓着目前工人斗争之有利的客观形势来推进革命的职工运动。

上海的工会工作，大半年是陷于削弱的状态。直到最近才开始走上轨道，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一）十月份较九月份原有会员是发展了一倍；（二）纱总已由七个单位增至二十几个单位；（三）开始夺取一些新的阵地（在××里和××上的工作），成立丝总筹备会与码总筹备会，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工人要求“老工会”的领导，自动脱离黄色工会，加入赤色工会；（四）开始恢复失业的工作，成立了东区失业委员会；（五）在业的非党的工人积极分子是加多了；（六）工联及纱总

的本身比较健全起来，造成了转变工会工作的一个前提；（七）进行了一些政治鼓动工作，选举了几十个苏大会的代表。这些成绩是十分微弱的。工会工作还没有取得基本的转变。争取这个转变是整个江苏党的任务。

目前工会工作的严重现象表现于：（一）没有抓紧和领导一个大的工人斗争，独立的革命领导这个问题很迫切摆在我们的面前；（二）对各厂的情形没有充分的了解，与厂内的联系仍非常薄弱；（三）组织上的发展与政治的影响之间的距离依旧相差甚远，全上海仅有××赤色会员，不到全体工人××分之一；（四）下层的组织如赤色小组与各产总的分会没有很好的生活，大都还没有成为厂内工人斗争的组织者，在赤色小组里没有形成党、团小组，在党、团的产业支部会上很少讨论工会的工作；（五）厂内的附属组织没能多多地建立，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女工代表会等，这是没有执行广大的下层的统一战线的结果；（六）失业工作仅仅开始，党、团的组织没有进行失业的工作，因此到现在没能建立一个失业的群众组织，在东区茅联^①的工作虽一度紧张，但始终没有把它更大的加强起来；（七）许多重要的阵地至今没能恢复（沪西纱厂、××烟三厂、××报馆），市政工作至今未能整顿起来，铁路工作还未开始；（八）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也还停留在决议上，没有建立一个革命反对派；（九）工会组织，首先是团没有认真的去进行青工童工的工作，江苏团省委没有动员全团的组织来彻底执行中央九月一日关于江苏团工作的决议，将青工的工作交给经斗部，而经斗部对实际工作又极不负责，使团与青工群众联系的问题成了非常严重的状态，广大女工中的工作更是无多大成绩可言。

中央认为必须依循下列的方向来转变上海工会的工作，争

取我们的伟大成功。

（一）必须改变工会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的地位，自支部、区委以至省委必须将工会工作视为主要的工作。法南区委公然将工会工作放弃而专做学生运动的现象应该停止。“谁不愿作工会工作，谁就不是革命家”的口号，应该非常尖锐提到每一组织、每一个党员的面前。

（二）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到最受资本进攻，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这在上海就是纱厂、丝厂、烟厂和主要的码头及两条铁路。同时要采取有力的步骤恢复和加强我们在市政工人中的工作与创立几个重工业中的工作基础。这所谓重心不是写在决议上，挂在口头上，而是要在党的力量的分布中，在整个的工作计划中具体的实现出来。

（三）以企业为基础来改造党、团、工会的工作，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到建立工厂小组，“这是特别重要的组织。一切主要的运动力量，就在乎大工厂中组织工人，因为大工厂不仅是数目多，而且影响、发展与斗争能力，在全工人阶级中也占着优势。每个工厂应当是我们的堡垒”（《列宁全集》第四卷××页）。为此，必须建立工厂的巡视制度，来组织厂内的通讯网，有系统的切实的帮助厂内的工作。

（四）有系统的和坚决的反对工人状况极小的恶化，反对各种方式的对群众生活程度的减低，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压迫与进攻，坚强的争取对于工人的经济的政治的罢工的领导。在目前尤应抓紧冬荒年关的斗争。须要比以前更周密的和完善的准备经济斗争，必须严格的和彻底的实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路线。

（五）在上海现有的赤色工会组织没有一个是从小厂内广大群众中选举出来的。应该开展工会的德谟克拉西，勇敢发展自

己的组织，这必须推动下层的自发性，残酷的反对数目字的摊派的官僚方法。应该了解“不经常的和有系统的征收会员，对参加革命职工运动工人不加以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就不能加强和扩张我们的阵地，不能消灭会员的流动性和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中强有力的因素”（职工国际八次全会的提纲）。在这里，纱总削弱和烟总完全瓦解的教训是值得特别研究。目前纱总老怡和分会的情形，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

（六）“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准备思想上坚定的干部。革命的职工运动，应该注意非党积极分子思想上的教育，不造成这部分积极分子就不会成为群众的运动”（见提纲第八段）。在上海，旧的职工干部已经不多，最近已提拔了一些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对他们的教育是非常迫切。要锻炼大批新的力量，才能完成新的任务。

在最近的时期里，这些新的具体任务是：

（一）在组织和领导纱厂工人反对减工关厂和生活恶化的斗争的基础上更大的开展纱总的工作，恢复沪西纱厂的阵地，加强东西区纱总办事处的工作，立即开始准备召集上海第二次纱厂工人代表大会来补选或改选纱总执委，使纱总执委内能包括各主要纱厂的和各派的代表及通过纱厂工人的斗争纲领。

（二）发动码头工人的斗争，将正在工作着的码总筹备会经过群众代表大会的选举变为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海上、沪东及浦东各区应在所属的码头上用一切力量开辟和加强党的工会的工作。省委应帮助海委及工联制定码头工人斗争纲领和码总组织章程。在大会开幕前必须分头召集各码头的工人群众大会，开展最广泛的群众工作。

（三）上海百余家丝厂除十四家外均已停工。江苏党、团、工会应立即经过现有的丝总筹备会及厂内的赤色小组进行广泛

的群众工作，反对关厂及要求资方、市政府救济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来扩大建立丝厂总工会的运动，首先是扩大赤色小组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建立各厂的分会。此外，必须成立反对停厂的群众斗争委员会。

（四）加强东区失业委员会的工作，创立西区和浦东失业委员会，来广泛的在失业工人群众中组织要工作、要救济的斗争，特别是要准备冬荒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才能建立包括最广泛的群众的失业组织。

（五）应动员一切力量，首先是闸北区委来建立铁路工作，最迟亦须于十二月初首先成立京沪铁路工作委员会。着手恢复市政的工作，利用在烟厂中现有的关系和力量，扩大烟厂的工作，争取烟厂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把英美烟三厂的阵地恢复起来。

（六）向工联青工部与团省委建议，必须加强在青工群众中的工作，首先筹备纱厂青工代表会，实现少共国际关于青工工作致中国少共中央的信中的全部指示。

（七）切实的开始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首先在邮务、烟厂建立强有力的反对派，恢复新闻报馆的阵地，成立黄色报界工会里的反对派。

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在基本上转变工会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整个党的工作之面向企业便是完成这些任务的保证。目前省委的领导是没有向这方面进一步，甚至非经中央的屡次督促，便不讨论工会工作的问题，而对于工人斗争（最近的电力斗争、英美厂的斗争等）是敷衍了事，没有任何争取领导的决心与准备。这种现象虽早经中央一再指出，而省委的领导则仍行其所是，这使中央不能不得出目前省委的领导是不能保证工会工作这一坚决转变的结论。

最后，中央认为必须指出江苏党的本身情形，她的政治的和组织的状况。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江苏省委应该为哪些组织的任务而斗争呢？

很明显的，在大破获之后的第一个组织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恢复组织——首先就是恢复大产业支部。在这方面江苏省委也做了一些艰苦的工作，但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一）许多重要阵地没有恢复；（二）在破获后已经有过关系的个别的但是重要的堡垒重新失去；（三）这些产业组织的丧失是大大地打击了工会工作；（四）未将在有些厂内的个别同志组织起来成立支部；（五）许多外县党的关系至今没有恢复起来，对于外县的工作一般的是隔离的，不能给中央任何具体的材料来检查工作。

第二个组织任务，便是巩固现有的支部——首先是产业支部，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夺取新的堡垒。但是目前（一）江苏党在产业中的组织基础不但没有扩大，反加缩小；（二）产业支部的工作没有摆在中心的地位，中央关于产支的决议至今不仅没有具体的实现出来，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讨论，都没有切实的举行，省委对产支的检查，只是写在计划上；（三）产支没有被推动起来，注意工会工作；（四）征收的工作没有经常的有计划的进行；（五）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这是支部中流动现象依然存在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区与健全区的领导。

但是省委对区的领导与具体帮助是十分不够的，在很长久的一个时期省委常委不与区书发生关系，专靠巡视员去指挥区的工作，对各区的工作从省委方面没能有计划的加以检查与在常会上专门加以具体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区之不重视工会工作没有与以有力的纠正。这便造成了各区目前严重的情形。

第四个组织任务，与巩固产业支部和区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建立区的和产支的巡视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在十月里才开始。正因为没有切实的巡视工作，使省委更加与下层情形隔膜，无法实行具体的灵活的领导。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省委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不去注意建立巡视的工作。

第五个组织任务，就是在组织上来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勇敢的发展组织。但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我们应该指出江苏党所表现的：（一）不是数目字的摊派方法，来一个冲锋，便是根本放弃；（二）征收的工作始终没有成为每一支部的日常工作；（三）征收入党后，不立刻划交支部，予以党的训练，因此形成不断的流动性。在今年十月节前后共仅发展不到××新党员，这种生长的速度的迟缓的主要原因，就是党脱离了群众的斗争，没有艰苦的在企业中的工作。

第六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群众的组织。省委对群众组织内的党团没有好的领导。群众组织是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群众组织的削弱，使党更加隔离起来，得不到群众的掩护，而一切运动之来，便只得动员先锋队去打头阵，后面没有广大的援军，这也就是江苏党不能发动一个胜利的群众运动的原因。

第七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为党的存在与生长而斗争。这包含（一）改善党的秘密工作，严密自己的组织；（二）开展反叛徒内奸的斗争；（三）动员广大群众反对白色恐怖。这个任务是执行得非常微弱，区的组织和省委本身的机关不止一次地受到破获，甚至在省委个别负责的同志中表现出极不可容忍的自由主义，国民党法西斯的内奸能够打进我们的产业支部——这一捍卫党的第一道防线，这些事实都证明江苏党的阶级警惕性之不充分与没有把巩固党的组织与开展群众反白

色恐怖及其他运动联系起来。中央认为巩固和稳定党的组织——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是今后更顺利开展全盘工作的基本条件。现在法西斯蒂的恐怖配合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凶猛起来，我们应该动员群众团结成广大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应该理解：我们党之能生存与发展就要与群众结合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最后如干部的问题、党的政治教育工作，都非常迫切的摆在江苏党的面前。宣传鼓动工作非常微弱，《列宁生活》不能经常出版，各区大半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一个真正的工厂小报，党支部小组的政治生活都需要大加改善。这些工作在提高每一党员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和因此而提高整个党的战斗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应该了解：在目前猛烈开展着的革命形势与两个中国进行决胜负战的时候，党和革命之所要求于江苏党者至高且大，不提高党的水平是万难完成这些伟大的迫切任务。这使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很尖锐的摆在江苏党的前面。

中央认为上面的各种组织任务是要求新的省委来动员江苏党继续用力的去完成。这就是：（一）不使大破获后的一个失掉的组织和党员再不恢复起来，而这一工作是有一切可能完成的，抓紧各区要求恢复的积极性很迅速的去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于外县的工作，省委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恢复和加强领导。（二）真正的检查几个产业支部，从这些检查中得出整顿其他产业支部所必需的教训，产支的巡视工作应立即开始。（三）调动江苏党最好的力量去巩固区，争取沪西、沪中、闸北工作更大的成功，特别注重烟、纱、码头所在的各区的工作，保证于最近期内选择十个得力的区的巡视员，改善省委常委管区的方法与内容。（四）勇敢的以企业以支部为主

干的开始征收党员的工作，提出至明年春为要能恢复主要的阵地，增加数倍党员而斗争的任务。（五）动员全党来创立和扩大群众组织。在工会方面要为创立群众的纱总和码总的组织而斗争，青年团应该在开展青工斗争的基础之上为恢复旧有团员和新的发展而斗争。（六）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不使没有一个支部没有党校，没有支部的壁报，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群众的领袖。（七）大胆的提拔在斗争中检验过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工会的领导工作，培养大批新的干部。

三

江苏党目前的工作是很严重的，摆在江苏党面前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发展我们共产主义者的创造精神来执行这些任务呢？

中央认为首先必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与两面派的斗争。

江苏省委在××同志领导之下正是陷入了这一官僚主义的泥坑，虽经中央无数次的指示与督促，而终莫能彻底的转变。这一官僚主义领导表现于：（一）不深入下层，与实际情形隔离（不愿意直接管理区的工作，不切实了解一个产支的情形等），因此不能实现具体的灵活的领导，这就不能抓紧生活中的一切事变和变动着的情形来脚踏实地的把工作推向前进；（二）既不愿意去了解实际情形，艰苦的去进行工作，便走上了便宜的道路，一切都是命令，用数目字来代替具体的领导；（三）不负责任的敷衍，决议上的夸大，口头上的允诺；（四）没有一点自动性，对工作既不认真，又无责任心，因此不能自动的先一着的提出许多问题，自加警惕；（五）对工作和实际

情形既没有深入的了解与各方面的打算，便不能规定工作的计划，看到一定的前途，而是件件应付，潦潦草率，省委常委本身就没有好好的过着有计划性的生活，催得紧了，便定出一个包罗万象代替了一切组织的计划，失去了党的中心的领导作用，束缚了下层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的自动性，这成了包办“计划”，不是领导整个工作；（六）官僚主义的领导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不听取同志的意见，这就不能团结党的干部来集体推进工作，省委的集体领导至今并未好好的形成起来；（七）没有开展正确的自我批评（中央一再指示要把反官僚主义的问题提到全党及其他群众组织讨论，但至今并没有进行，虽然下层同志已感觉到省委的领导非常严重而且正在积极起来批评，但省委不去领导和组织这一积极性……）和用各种武断的方法来拒绝批评；（八）官僚主义者为了政治上的应付，把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条文，变成口头禅，在××同志领导之下的省委没有真正抓住一个机会主义者，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甚至已经揭出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省委也没有给以严重的打击。

由于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中央的指示便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同志每次都在口头上同意和拥护中央的路线及一切指示，但在实际上则阳奉阴违不去执行。××同志曾给中央许多好听的允许，但没有一件实现，甚至采取撒谎的方法，以避自我批评。

中央认为江苏党是中国党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在中国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荣的页子。他现在仍然是党一个最大的支柱，他有一切可能来转变自己的工作，比现在能够取得更多更伟大的成功。而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领导正是障碍着江苏党走上胜利的大道。中央引为非常欣慰的便是在江苏党员队伍的中间已经开始起来反对这一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领导，而且

这种积极性将更加增长，这是江苏党走到转变的重要因素。中央认为在省委里反官僚主义方式的领导斗争是不充分的，但中央确信省委的大多数委员已经有了这个决心，表示他们对党的总路线的忠实！

中央认为目前江苏省委的领导是不能保证执行党的总路线，须加以改组，××同志的书记职务即予撤消，以××同志担任，及吸收大批新的工人同志参加省委的工作。中央坚决相信江苏新的省委会能团结江苏党的队伍，把反对官僚主义两面派及各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正确的开展和深入到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去，以领导和组织江苏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首先是英勇的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冲破五次“围剿”，来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 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已经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国民党已经最公开的变成了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全中国广大的民众也从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方才能够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同侵掠中国的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保障中国的独立统一与求得中国民众的彻底解放。同时苏维埃与红军反帝反国民党的伟大胜利，在全中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了只有坚决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的道路，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最后的解放出来。因此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也是大大的增加了，他们要求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中革命的出路!

在这一革命形势更加尖锐化的情形之下，在反革命国民党统治内部的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实是不足为奇的。在福建一部分国民党的领袖，因为国民党的根本破产与广大民众的革命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红色中华》。

化，所以最后抛弃了国民党的尸体，自己创立了他们的生产大众党，把他们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并且提出了他们新的主张与新的政纲。无疑的，这是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的最具体表现与重要关键！

但是自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它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它一方面宣布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但是同时却宣布临时戒严条令以取消他们在口头上所给与人民的一切权利。它的政纲上写着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均受最大的保护，然而它对于工人与劳苦民众的生活，并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的办法。它的“计口授田”实际上只是要农民不自动起来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斗争，同时它对于农民目前所不能忍受的苛捐杂税以及一切压迫与痛苦状况，并无丝毫的改变。即是它所号召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只有空喊，而并无具体的布置与行动，它的人民义勇军实际上不过是地主武装（民团）的改名。真正武装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开始。一个月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以及全中国民众，决不相信一切口头上宣言上的革命辞句与好听的革命的名称。只有实际的革命行动才能证明一切政府的是否革命。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予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

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民众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行动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希望或期待任何上层统治者的“革命”来代替民众自己的革命斗争，结果必然是不能补救的极大的失望！

中国共产党号召福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革命工会，农民自己的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成立吸收广大工农群众与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参加的反日会，成立反日反蒋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以及各种各色人民的别动队，并且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散发武装，武装他们，联合革命的士兵群众同进攻福建的蒋介石部队与准备武装干涉福建的日本与任何帝国主义力量决战。福建的民众必须自动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刻收回日本租界与关税，宣布一切对日不平等条约的无效，开展真正抵制日货的运动，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的企业与财产，并且把它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福建。必须立刻逮捕一切卖国贼汉奸，镇压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来充实反日反蒋的战争经费，来分配给劳苦的民众。同时工人必须以罢工等斗争，来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与工资的增加，农民必须以抗租抗税，解除地主武装，武装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必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立刻采取紧急办法，救济城市与乡村的失业工人与贫民，并改良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此外，福建的民众应该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响应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历次反日反帝与反国民

党的宣言与号召，不再进攻彻底反帝反国民党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联合一致去进攻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首先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福建的民众与全中国的民众，也就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民众宣言，在全中国民众前面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与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民众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一切反帝反国民党的民众联合起来！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揭破一切欺骗民众的阴谋与武断宣传！

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一、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用新的欺骗，以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来愚弄群众，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阻止群众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此来夺取反动统治中的领导权，去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最后崩溃，也就是挽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便利它们瓜分中国的殖民地化的道路。

二、福建事变表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更加削弱和崩溃：（一）国民党的旗帜和招牌已经破产到这种地步，甚至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类的军阀，都也不能够不公开的声明退出，为的要用新的旗帜和招牌（“生产党”、“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实行地主资产阶级救的武断欺骗的企图；（二）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之间——反映各帝国主义的冲突——所生长着的深刻的矛盾，又爆发了一次公开的破裂。福建的十九路军军阀企图打出新的旗号，用新的进攻革命群众的方法，去讨好帝国主义，代替那些蒋介石等的军阀的头等奴才的地位。

三、但是，要知道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削弱和崩溃的加深，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的革命斗

争的强大的开展。革命斗争的开展和尖锐化，一方面使得一切反动势力团结起来进攻苏维埃革命运动，而别方面也在打击这些反动势力，使得他们中间不能不更加迅速的暴露裂痕，不能不争先恐后的抢夺“新鲜的剿共方法”。蒋介石的法西斯蒂蓝衣党、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冯玉祥的“抗日政权”以及这次福建的“人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统治迅速瓦解之中，地主资产阶级各派军阀集团的层出不穷的新的武断宣传和欺骗方法。

四、苏维埃红军正在冲破五次“围剿”的伟大的胜利，苏维埃领土的日益扩大——帝国主义进一步的瓜分中国，帝国主义间的分赃斗争更加剧烈了，而反映帝国主义利益的各派军阀间因争夺日益缩小的地盘冲突，也更加尖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闽北给了十九路军严重的打击，福建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同情和赞助猛烈的发展——这些情形，使得福建不能够不暂时对红军“休战”，企图挽救自己的反动统治，缓和民众的反抗和革命情绪，以便准备新的力量，制造新的旗号，来继续进攻苏维埃红军。

五、国民党军阀——十九路军的也在内——最近半年来的卖国政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出卖满洲、华北，对于英、法、美、国联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的适应，断送西藏、西康、云南等等，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的坚决反帝国主义斗争。上海战争（一二八）、热河事变（华北中日协定）、棉麦借款、国联技术合作……不断的暴露着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凶恶残暴卑劣无耻的真相。他们的政策是，不惜用任何代价去投降帝国主义……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更大的帮助，来镇压一切反帝革命斗争，首先是进攻唯一的反帝武装——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这种真相的赤裸裸的暴露，不断的打击着他们的武断的

宣传。民族解放的反帝革命运动和战争，迅速的引导着广大民众和兵士走上苏维埃的道路。这使得蔡廷锴等类的“民族英雄”，在他们军阀自相冲突的纷争之中，更加“警心的”估计到一致进攻革命势力的任务。他们就企图用“退出国民党”、“号召反帝革命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的新的武断欺骗，来阻止群众革命化的过程，阻止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用新式的“反帝”的假招牌，来掩蔽他们的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老政策。

六、广大的罢工潮流，农民贫民兵士的革命斗争，到处不断的发生，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和劳动解放的事实，成了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极巨大的推动力。现在不但因为世界的和中国的经济恐慌、失业、饥荒、战祸，而爆发着不断的劳动群众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这些反抗和斗争都向着觉悟的阶级的最后决战——为着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前进。全国劳动群众的一致拥护红军，反对五次“围剿”……这一切使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更加接近根本灭亡的道路。因此，所谓“人民政府”就企图用“耕者有其田”、“保护劳动”、“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普遍选举”等等的改良政纲，来同苏维埃的革命政纲对立，企图在群众之中造成一些幻想，缓和苏维埃革命进展的速度，以便利反动势力的更残酷的进攻。这样，他们在企图着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

七、“人民政府”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一）他们对红军历次宣告的抗日作战协定，始终没有诚意接受；（二）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对于日本美国，正在做着暗中的买卖；（三）他们的一切“农工政策”和“民主主义”都决不会真正实行。福建的军阀、政客、第三党、AB团等等——不说他们内部还有许多派别和斗争——都只想

用这种政纲，来开始极大的新式的武断宣传，企图获得群众的信仰，提高其反对蒋介石，广东、福建内敌对军阀的地位，增加他们现在或将来与南京妥协的政治资本。这也就是为着增高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的身价。为了这个理由，他们认为对红军采取暂时的防守政策以及对群众给予各种口头上的允诺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实行这些允诺。在形势一经变化，红军稍有不利的形势或获得更大的胜利，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以及十九路军兵士更加革命化等，都要使福建统治者立刻露出他们的原形，抛弃他们一切的允诺，实行更残暴的屠杀群众和进攻红军苏区。这是因为福建“人民政府”的阶级基础，同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它根本上也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八、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在反对民众革命，反对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对根本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问题上，也就是在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个基本问题上——都是一致的。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企图用新的欺骗来实行进攻革命罢了。它的政纲和行动完全证实着这一点。不用说它在政纲对于群众的“允诺”不会实行，就算实行起来，也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形式。对于帝国主义——它除开“否认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之类的谎骗的话以外，丝毫也没有什么别的。国民党也用这类的口号欺骗了人民好几年，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它做了一切帝国主义走狗所能够做的卑劣无耻的行动。福建“人民政府”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动，事实上都在多方阻碍，像他们这班军阀在上海战争之中出卖了兵士和民众一样。对于土地革命——他们说什么“计口授田”，然而他们对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没收地主土地

的革命行动，还是在压迫。而且他们在口头上，纸面上都不敢提起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对于保护劳动的问题——他们只说着一句空话，而接着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这意思很明显的表示着保护资本家而反对工人阶级。对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对于所谓“生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问题——他们事实上不会实行释放政治犯等等，或是旧的政治犯刚才释放，新的政治犯又要逮捕，而且他们的所谓“生产人民”显然包含着资本家地主在内。这种所谓“生产人民”的政府毫无疑问的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像欧美的一切“最民权主义的”政府也必然是资本专政一样！这一切很明显的表示着，福建的“人民政府”是企图用民族改良主义的空话，用新的“反帝”、“民权”、“解决土地问题”、“保护劳动”等等欺骗的武断来敌对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革命！

九、中国的劳动民众必须了解他们这种新的欺骗必须抛弃一切对于他们的幻想。中国的脱离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大多数劳动民众的脱离封建残余的土地制度，中国工人阶级的推翻中外资本家的剥削统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冲破和粉碎五次“围剿”，发展劳动群众自己的广大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工业，剥夺一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建立工农劳动民众的自己的政权和国家！而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帮着帝国主义实行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的一种新的企图，也就是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的新的企图。中国的两条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和苏维埃革命的道路——的斗争，中国的两个政权的对立——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对立，在福建事

变之中格外明显的表现出来，更加尖锐地开展出来。中国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抗日的，反对瓜分的政府。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一切殖民地民众，要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着一切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进攻，而达到真正的解放。而福建“人民政府”，同国民党的各派一样，不过用了新的欺骗和方式，在反对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的革命，在适应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政策，适应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而取得中国的“战场”，作为一致进攻苏联，压迫世界革命发展的根据地的政策！

十、我们必须暴露福建“人民政府”的这种实质。我们尤其必须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其他各派借口福建事变而更加残酷的施行白色恐怖！我们要更广泛的更努力的在一切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革命政策。我们要同群众日常斗争联系着，提出一切民主权利的要求，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反对全国一切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资本家的一切种种压迫，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剥削压迫的事实，要使得群众明了：只有群众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能够改良自己的生活，能够达到自己的解放。我们要这样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来反对五次“围剿”，粉碎五次“围剿”……没有群众的猛烈反抗和伟大的革命斗争，五次“围剿”决不会因为福建事变而放松。我们要广大的宣传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反帝抗日的，我们要广大的宣传苏维埃政府对于全国兵士群众所提出的“抗日作战协定”的政治意义。我们要发动全国民众来赞助这种政策，要求一切武装部队都立刻停止进攻苏区，立刻解除苏区的封锁，立刻开始抗日战争，立刻武装民众，立刻停止对民众反帝抗日言论、集会、罢工、武装等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我们要

广泛的暴露国民党的一切卖国步骤，最近的中日直接交涉，请求英国宪兵帮助维持长江秩序，蒋介石的欢迎英国公使，利用美国棉麦借款等等加紧屠杀民众和进攻苏区……我们要广泛的暴露福建“人民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的每一件事实，每一次的言论行动（例如福建政府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说“抗日等于自杀”等等）。我们要反抗国民党的戒严，及一切新的压迫事实。我们也要暴露福建“人民政府”的每一次压迫民众的行动，如一面允许各种自由，一面立刻宣布临时戒严条例，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我们要坚决的反抗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新的欺骗！我们要揭穿一切反动派造谣惑众的企图，明显的指出福建事变的真正意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政策。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 倾向作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刘 少 奇

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钱劳动者进工会来，活跃工会的组织，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职工国际屡次在决议案上指示我们，苏区的职工会决不能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为次要的或附属的任务。工会要利用工人群众为自己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引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造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但是职工国际的这些指示，许多工会干部还没有能够彻底了解，忽视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在我们工会的组织中还是严重的存在着。

虽然，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央苏区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上是作了一些工作（如订立合同，开办一些合作社以及征收土地税等），但是这些工作还没有成为工会一切组织的经常工作。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并没有深入的细心的去了解自己组织内一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苏区工人》第四期。

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些什么不安的问题？有些什么可能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对于这些事情是茫然的。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讨论过工人切身的问题。工会社会经济部（这是工会最重要的一个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没有人来负责这个部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上级委员会的报告，也就常常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材料。

倘若我们向许多工会工作的同志发问：哪些工作是工会重要的工作？同志们都可回答：“扩大红军、查田、经济建设等是工会的重要工作。”但是很少有同志回答，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是工会重要工作的。许多同志对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估计得不足的。所以他们没有亲密的去接触和了解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没有严重提出工人不安的问题，并想尽一切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工人已经向工会严重的提出他们不安的问题的时候，工会的负责人还是随随便便的毫不负责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这就要使得一部分工人对于工会工作，不发生兴趣，从交工会的会费到工会的会议，以及工会所号召的各种运动，都没有兴趣来参加。但是工会工作，不独是要使先进的工人发生兴趣，而且要使落后的工人都发生兴趣。这就必须要工会慎重的来处理一切工人所提出的日常问题，获取工人对工会的信仰。

胜利县有差不多两千工人（部分是铁匠）没分到田，同时又没有工作做，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他们经常要求离开本乡到外面作工，但是苏维埃不发路条给他们（为的是怕无人作义务劳动），或者只发十天半个月的路条给他们。对这个问题胜利县工会从来没有向我们作过报告，从来没有严重的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难道不是严重的错误吗？像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胜利县有，石城县的平安区、洋地区等也有几百工人未分田，甚至还

有几十个雇农、苦力未分田，他们还是靠作些不定的劳动过活，石城县工会也是没有用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此外如博生的夏布问题，乐安的纸业问题等，都是差不多的。

有的同志会向我们说，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们想不出办法。但是，同志们！并不是没办法，而是没有去想办法！现在我们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着，我们有各种可能的条件来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我们根据当地的条件来想办法，发动群众大家来想办法，提到苏维埃，提到上级工会大家来想办法，我们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今年春天工人缺乏粮食，许多同志认为是没办法的问题，但有许多地方发动了群众的互助，向富农地主借谷，以及要求苏维埃的救济等，解决了粮食缺乏的问题。但是还有的地方不去想办法的，就使工人饿死了的也有（如汀东、武平、洋地等）。福建的农业工会向中央政府借了四千元，买粮食去救济会员。又如今春纸业工人的失业问题，纸业工会想了许多办法来倒下了几万石竹麻，现在福建失业工人已经不失业了。但乐安的工会不去想办法，失业工人现在还是失业的。去年宁都的船工失业，工会组织工人到某处山上去斫木柴，用船装到宁都来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又如某处木匠失业，工会和苏维埃交涉，将山上的树斫来作木器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从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只要大家实际去想办法，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工人的困难问题，都可以有办法来解决。即使真的想不出办法，就是要求苏维埃从剥削者那里抽出钱来，救济饿饭的工人，也是可以的。今年夏季就这样做了很多。

有的同志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成仅仅是订立合同或实行劳动法。因此，他们忽视失业与半失业工人，忽视农村中大部分分了田的工人，没有去研究这些工人、雇农的

困难，以及如何帮助他们，但实际上在苏区极大部分的工人、雇农是没有长期合同的。对于这些工人的问题如果忽视了，那苏区的工会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工会。

现在我们工会工作在这一方面，还需要有更大的彻底的转变，需要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需要教育工会工作的干部，善于在工人日常问题上去接近工人、教育群众，获取群众的信仰。各级工会委员会尤其是支部委员会，应经常拿住工人的日常问题来讨论，并给以解决。上级的工会委员会应经常督促下级的委员会来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与苏维埃取得一致，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对于个别苏维埃的负责同志不管这些问题，不管工会的提议，也应该以同志的态度给予批评，或者要求上级机关来解决。

现在中央政府预备从经济建设公债中拿出二三十万来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的生产，创办东方贸易公司，大开钨矿，及开办纸业、烟业、夏布、樟脑、石灰公司等。各级工会委员会必须发动工人来参加这些工作，召集各业会议，订出计划，征调干部，帮助政府搞这些建设。因为这对于战争，对于工人生活的改善，均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工会在讨论和解决工人日常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刻不要忘记从这些日常问题上来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纠正工人中某些分子的行会的思想。必须在这些日常问题的周围来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红军及战争动员中的一切工作，向工人说明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扩大，才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如赣东北工会工作中那样的倾向。埋头于讨论工人的日常问题，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工会的缺点就是在解决工人的日常问题中忽视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与觉悟，忽视了加紧动员工人群众为巩

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他们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一切都说到了，但对于扩大红军的工作与参加苏维埃的工作等，甚至一字都没有提到。这不仅是极大的缺点，而且是一个错误。在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需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要把工人为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在目前是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 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 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央局检查了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十天成绩，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报名的数目，还只三千九百人，只当原定计划百分之十五六，送到补充师的只六百名左右。突击运动不能完成的危险已摆在我们的前面。中央局仔细分析了突击运动没有开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运动中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在实际上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突击队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还有重大的缺点和错误。为着保障百分之百的完成中央所给予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的任务，中央局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坚决执行下列的指示：

(一) 我们的运动既要经过突击队发动，就必须保障突击队是最坚定最积极最有纪律最能深入群众的队伍。

如果突击队里面存在有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消极怠工分子、不遵纪律的自由行动的分子以至开小差的分子，那就会使突击队本身麻痹腐化，不只不能担负党给予的任务，并且要成为突击运动的阻碍。这次突击运动，的确动员了成千干部加入突击队，最大多数干部的确积极的在那里为着党的任务斗争。可是像下述的坏分子，仍然在许多突击队中发现着。

在瑞金各区突击队长中，我们看见陆定一同志的悲观失望，绝望的提出只有在支部中规定同志当红军，用罚钱来强制耕田队；谢佩芳同志痛骂区一级都是坏人，乡主席没有好人；刘海波装病脱逃；康道垠、刘盛莲的标本的实际工作机会主义；甚至在中央突击队长中，梁广同志像谢佩芳一样的咒骂石城干部；古柏同志在会昌领导上表现出来的标本官僚主义；粤赣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者迟到十号才动员突击队下区；兆征县突击队长全日在干部里面兜圈子等。此外在瑞金一部分区乡突击队员中，发现不少朝去暮归，作工半天，做零工以及跑来跑去参观的现象，并且还有开小差的分子。在瑞金正在开展反对上述现象的斗争，但这种现象在各县亦不可免的发生着。

中央局严重指出，在整个突击运动前面必须立即检查各级突击队的质量成分，立即进行突击队的改造。办法如下：（1）对于动摇的官僚主义的消极的队长必须立即撤换；（2）队员中动摇消极怠工等以及不遵守突击队纪律分子，不能立即纠正的，必须洗刷出突击队；（3）开小差的分子无保留的洗刷出队；（4）能力不能任突击队员或不能解放其他工作专门来任突击队的必须解除突击队职务；（5）不要把归队的分子编入突击队，报名的新战士中，也只能从最积极分子中选择极少几个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加入突击队；（6）上述一、二、三项被洗刷的分子，必须在当地组织中开展公开的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群众；（7）最后，突击队中的缺额要吸收在运动中表现出最积极坚定而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干部补充。

突击队必须是最精悍的组织，不在数量多而在质量好，这一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二）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是一个千百万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不是由若干突击队单独可以做成的。突击队的任务，就在

帮助和推动当地党部的领导，推动和帮助当地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去动员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一切企图脱离当地党部的领导和超过当地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动员，必然遭受到失败。这种错误，在过去是很普遍的，所以中央局在中央突击队出发以前曾再三着重的指示这一点。

这次突击运动中，仍然有许多地方重复这种错误，特别是区乡两级。如把团的活动分子会、支部会合并到党里面开，取消了团的独立动员工作；赤少队也是只开混合的干部会议，以及不动员一乡一村的苏维埃、工会、女工农妇等组织；最后突击队下乡甚至连党的支部、小组都不理的现象也时常发生。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主要的是突击队企图脱离和超过这些当地的组织，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地方党、团、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把突击运动看成突击队的事情，自己不积极去动员所领导的组织。

正确的办法应当是：第一，一切比较重要的问题和工作上的决定，必须提到当地党的领导机关讨论，如果属于团的，还应当提到团的领导机关，属于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以此类推；第二，突击队（无论是以团体为单位组织的或者以各组织之代表组织的）当下去工作时必须有一定的分工，分配一定的队员去帮助党、团、苏维埃、工会、赤少队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推动各个组织去动员自己的干部和群众。

推动和帮助当地党部和群众组织，当然不是一个命令可以作到的，而要经过共同的讨论与协商。并且在要动员千百万群众的突击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事实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的干部中以至支部中，我们遇到了动摇分子，对突击运动消极旁观的分子，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对反革命缺乏警觉的分子。在大多数干部和党员积极动员的时候，他

们却来散布悲观失望的影响，甚至施行破坏的作用。他们如果是负领导责任的，更加要直接妨害当地整个动员。我们不否认石城和合龙的干部中有动摇消极的分子，并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我们所以坚决反对梁广、谢佩芳同志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动摇消极的分子投降，帮助这些分子诬蔑积极的干部，藉此来脱卸自己的责任。

很明显的，在这次突击运动当中，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一般的说是没有开展的，就在瑞金也是极不够的。然而瑞金的事实已再一次的证明，哪个地方相当开展了反机会主义斗争，哪个地方的动员便有成绩。反倾向斗争没有开展的原因，部分的由于突击队的领导者中表现机会主义的动摇，一般的由于没有抓住具体的事实和具体的人去发动斗争，而多是空洞的喊两条战线斗争，或者斗争了，但没有作出必要的组织结论。

为着保障突击队任务的完成，必须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怎样作呢？第一，必须很警觉的抓住每一个具体的倾向来揭发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例如下肖区群众公审大会要求枪毙一个开小差的顽强分子，而区苏裁判部长表示不敢执行；如陆定一同志提议规定党员当红军；如说人口少不能突击等等）。第二，对犯了重要错误或不愿改正错误的，必须予以组织上的结论，如果是领导者，必须撤消他的领导工作。第三，一切倾向都须公开揭发，才能教育群众，对应该作组织结论的同志，并须公开他的名字来斗争。第四，必须团结坚定的积极的分子在突击运动的前线上来，经过他们去动员群众。第五，必须注意随时提拔积极坚定的干部到指导机关，代替那些陈朽的动摇的干部，来改造或加强各种领导机关，这不仅保障突击运动的完成而且保障突击运动后各地领导机关能健全的继续工作。

在指导方式上，必须执行最紧张的工作检查以保障运动飞

速的前进。各县突击队长必须三日一次向中央和省委报告；各区必须每二日一次向县作报告；乡对区，村对乡须有更密切的关系；全县应该五天到七天召回各区突击队长作一次检查，全区应该三天一次，全乡应当每日一次。上级对下级的报告必须立即给以具体的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县委还须派人巡视。

（三）中央局在突击运动开始的时候，即指出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不只是广大的群众的动员，而且是残酷的阶级斗争。阶级的敌人不是蠢货，他们在这样伟大的群众动员中，无疑的要起来暗中破坏，在群众中散布他们的影响，以至公开的反抗。例如瑞金十天经验中，在合龙、河东、下肖、黄柏等区发现成批逃兵反抗我们的归队运动，其中都有阶级敌人起组织的作用。在下肖、河东、合龙的某些乡，我们逮捕了反动的领袖以后，逃兵陆续归队，群众也随着动员起来。黄柏和其他的区还没有能找出反动分子或者没有采取镇压他们的手段，不只归队无成绩，动员更是落后。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必须依靠于政治的宣传鼓动，依靠于说服群众，同时还要依靠于对阶级敌人采取惨酷的镇压。如果以为要说服群众，就可对于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缺乏警觉，可以放任他们或明或暗的破坏行动，那么不只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且要铸成一种罪恶。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方式是比较以前减少了，但是反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则表现很弱，必须纠正过来。

有许多地方，逃兵是整批开小差回来的，他们之间原来就有反动的组织者在归队和扩大红军中，继续起反动的组织作用。此外有在查田运动前混入到红军中去的富农以至地主分子，他们开小差回来后，见了土地财产受了打击，更要加紧的来破坏我们的运动。所以我们在逃兵中，特别是整批的逃兵

中，必须追求出他们的领袖，把领袖与群众分开起来，对群众进行说服，而对领袖必须逮捕，公审以至对最顽强的分子执行枪决。追求反动领袖，不只要靠保卫局的线索，还要依靠群众，探听群众的意见，特别在发动群众和他斗争中来揭破他的面目，使群众了解，最好在群众前面逮捕。如果把群众或动摇分子当作反动领袖逮捕，会使群众怀疑以至反对我们，这同样是要失败的。逮捕了反动领袖，必须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宣布其罪恶，举行公审（尽可能举行巡回公审），立刻去争取他影响下的群众，说服他们（群众），稳定他们，使他们不怀疑我们而接受我们的号召。要利用公审大会等扩大部队和动员新战士的运动。

瑞金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逃兵中的党员团员依然在支部中生活。在逃兵多的地方，党、苏维埃、工会、赤少队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中，还有逃兵占着地位，以至作副主席部长等。瑞金几个月来扩大红军没有成绩，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突击运动中，必须彻底检查党员团员中开小差分子，首先在党内团内和他们斗争。坚持不归队的，开除党籍团籍，当作开小差的群众看待。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同样要归队，否则立刻撤销工作，顽强的分子同样要逮捕公审。

瑞金的经验还告拆我们一个重要事实，逃兵中的顽强分子，常常有站机关的坏分子（这些大概不一定是逃兵，常是逃兵的亲属，或者与逃兵有特殊勾结）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反逃兵和反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必须与反对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苏维埃的检举运动联系起来。

这里所指出的原则，不只对归队运动适用，对整个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都是适用的。

（四）在这次突击运动中，除上面所指示的外，还有几个

重大的弱点须得指出并给以纠正。

第一，根据现有的材料，逃兵多的县份如瑞金、胜利，动员成绩中最大部分是归队的。同时在材料中除很少几个地方外，没有看见赤少队整连整排的动员。这都是我们动员中的重大弱点。归队运动自然重要，但必须同时争取新的战士的扩大，至少要使新战士不少于归队的数目。赤少队未能整连整排的动员，表现了五、六、七几个月大动员以后，模范赤少队未能完好的组织起来，但这还不能说明这次运动中不能“有组织的动员”。各突击队和党部必须在赤少队有基础的区或乡，努力争取整连整排的动员，以保障新战士在这次动员中应有的比重，同时须在运动中注意赤少队的编制与整理。

第二，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仍是极其薄弱。兴国优待红军家属的群众运动的模范经验还没有被别县学会，耕田队没有加紧扩大和整理，特别是各级机关的礼拜六运动完全取消了，这种现象是不能继续容忍的。中央局必须再一次的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立即组织广泛的优红运动，首先每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党员和团员都要加入耕田队，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一直到支部书记和乡主席都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必须把红属组织起来吸收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党的各级军事部必须切实负起指导优待红属的工作，苏维埃内务部以至乡政府必须立即进行调查红属整理耕田队，分配劳动力等工作。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必须监督和检查中央和中央政府所颁布条例的执行。

第三，在胜利、瑞金等县表现妇女“拖尾巴”的许多的事实。瑞金城市有女团员公开起来强拖老公回家。瑞金许多区妇女部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积极性。突击队和地方党员必须切实指导妇女部工作，并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机关。

第四，根据过去经验，让新战士散布在乡村，等候定期的大批的集中，反增加集中的困难。这次必须争取迅速的集中，有了相当的数目即送补充师，举行热烈的群众护送。在集中前和集中时，必须加紧宣传慰劳工作。必须实行检举工作，洗刷老弱残废和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把党和团组织好，事先开好党团会议，确定每个党员和团员在集中和开动时的领导作用。党和团不只要组织好，还要有详细的登记，一分送补充师，一分留当地组织保存。必须特别注意干部的调剂，使每一队伍中有坚强的领导。开小差归队的，如果他原来领有被毡衣服等，必须要他们带回归队，以减少供给的困难。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周恩来关于请在 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与命令全权 给秦邦宪、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博古、项英同志：

一、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益以元电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二、十二日战斗后，十三日各兵团分撤各处，晚得军委第一重新部署密令，即五军团向得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继得第二电令，以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考虑后只能击一方，于是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十四日拂晓前，六师已行，不及追回，十三师在熊村之北又奉令迟疑，虽十四日白天我们连电三、五军团，指示五军团守备任务及兵力部署（以十三师除留一营在湖坊、洵口外，主力坚守新店、得胜关支点），然直至当晚，十三师仅有两营达熊村附近。因新店失去（彭、滕^[1]十四日以平电先我们十五日早始悉），我们不及知，而军委十四日十四时电至，乃又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军团坚守。夜，中央军委二十三时电又至，于是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十三师守得胜关。但五军团

两日无电至，三军团整日移动，直至现在三、五军团行动不明（五军团收我们电不答，夜中又动既又出）。六师、十五师亦不知现驻何地，而得胜关确已在敌手中。

三、依据上情，我们许多电令虽已发出，但终不知十五日我军情况究属如何，且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豪

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滕代远。

朱德、周恩来关于 红七军团的任务等问题 给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 蒋^{〔1〕}敌现正分路向顺昌、延平、古田前进，李默庵师已抵顺昌洋口，其控制邵、顺之间的一个师分一部驻水口，有进窥万安寨配合其三路军击我东方军右侧翼之企图，将乐驻军是十九路军抑系马鸿宾或靖卫团，情况不明。

2. 军委令我七军团在改编完毕后应于明二十九日先以一个最精锐的侦察营，经万安寨向将乐地域出动。

3. 先头的营应伪装闽中独立营离开七军团主力三十里左右路程，迫近关明行动，其任务：

(1) 与十九路军部队取得联络，在反蒋反日的共同行动下在该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2) 侦察将乐，如非十九路军而系团匪或空城，七军团应以一部驱逐或占领之，以便迅速征集资材。

(3) 侦察将乐，如系马鸿宾部应监视之，如马部自认为十九路军应逼其表明反蒋态度。

(4) 特别要侦察蒋敌部队在水口及顺昌行动，如该敌向将乐、万安前进，七军团主力须迟滞拒止和侧击之，但须避免决战。其先头的侦察营应于明二十九日十三时开动，并由七军团

政治部邓^[2]主任率得力宣传员十人同行，以便向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七军团首长应给该营以侦察和联络的具体指示，并由我们委托滕^[3]政委，如二十九日午前赶到泰宁，给你们具体工作方案，望等到后出发。

4. 政治工作原则：

- (1) 以革命战争反蒋反日。
- (2) 人民革命须给劳苦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
- (3) 组织和武装工农义勇军。
- (4) 与十九路军士兵亲善，以便吸引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关此已委托滕政委给你们说明）。
- (5) 总政治部将有详细指示。

5. 其他部署另电告。

朱 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邓乾元。
- 〔3〕指滕代远。